

# 離亂中的歡聚

## ——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的華人廟宇節俗革變

( 1948—1960 )

廖小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提要

本文以馬來西亞霹靂州近打縣端洛鎮(Tronoh)何仙姑廟當代誕儀展演為切入點，試圖在二戰後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的歷史脈絡下，爬梳與說明，當代端洛市區暨其周近華人新村(New Village)居民每年農曆八月以歡慶何仙姑寶誕之由共聚同樂的演劇打醮盛會，實為1950年代端洛華人面對英殖民當局圍堵馬共之「畢利斯計畫」(Briggs Plan)所造成的社區散離，以當地華社權威機構——「古廟(端洛何仙姑廟)義塚辦事所」為中心，重新聚合「闔埠街坊」並進一步更新其邊界的文化操作結果。相對於20世紀前期已存在如今卻相對靜默的三月誕舊俗，當代歡騰的八月誕實踐，實際上是馬來亞緊急狀態後期才開始踐行演繹的「新」傳統。本文指出，端洛何仙姑廟神誕傳統在緊急狀態時期的革變，並非孤例，其與霹靂州其他市鎮重要華人廟宇的相似實踐，共同揭示了該州華人民眾如何透過廟宇組織的運作和神誕儀

---

廖小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郵編：115201，  
電郵：hcliao14@gate.sinica.edu.tw。

本文研究工作從2016年起始至2023年完訖，前後歷經漫長田野調查與資料蒐集過程，期間承蒙洗觀燕女士、馮榮基先生、何木生先生、羅九先生、羅鈺峰先生等報導人費心解惑與照拂。本文部分章節初稿曾於2022年6月9日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宣讀，得蒙講評人劉永華教授、康豹教授以及與會的張寧教授、巫仁恕教授、林志宏教授等諸位先生惠賜意見，不勝感激。筆者由衷感謝陳瑤教授、兩位匿名審查人與《學刊》執行主編提供修改建議，以及謝仁晏博士協助繪製地圖、黃佩雯女士與陳彥蓓女士幫忙析理文獻。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式活動的多元實踐，因應馬來亞史上最大規模人口移遷政策的衝擊，重新兜攏「街坊」並確認社區範圍。這些例子亦展示了近代徙居馬來亞的新客華人，即便身處20世紀的殖民政制和不同政治勢力輪番傾軋的世局，猶能靈活挪用華南原鄉的文化資源，持續地組織和凝聚社群、勉力維繫並更新日常。與此同時，信仰作為當地社群回應眼下生活處境的文化策略，因而進入了全新一輪地方性演繹的創造與變遷過程。

**關鍵詞：**馬來亞緊急狀態、畢利斯計畫、新村、醮、何仙姑誕

## 一、前言

我對礦場事物的所有知識，來自於每晚大人們夜寐前的閒聊。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販售錫米或是賣給誰，但我記得很清楚，每年舊曆八月，頭家（*Towkay*，資本家或企業主）們總會捐獻大筆金錢慶祝當地神明何仙姑誕辰。慶賀何仙姑寶誕是端洛這個礦業小鎮非常重要和歡樂的年度盛事，這是鎮上眾多居民同心協力辦好一樁大事的關鍵時刻。依照慣例，大家會一起合作與分擔為舉行寶誕募款的繁重工作，全鎮居民都可以享受一整週的慶祝活動以及來自香港、新加坡和本地粵劇演員帶來的大戲表演。擺攤的小販荷包滿滿，我們孩子亦是最開心的，因為可以享受他們販售的各種美食……這是一年中除了農曆新年之外，父母會特別慷慨發給我們零用錢的時候。

Wong Soi Yin (1958— )<sup>①</sup>

1885年前後，盛產錫礦的英屬馬來王國霹靂（*Perak*）首府太平（*Taiping*），出現了馬來半島第一座主祀「八仙」唯一女仙——「何仙姑」的廟宇。<sup>②</sup>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太平南方的近打河谷地（*Kinta Valley*）礦藏資源陸續開發，取代以太平為中心的拉律（*Larut*），成為近代世界錫產量第一的礦區。（附圖1）近打河流域因華人「新客」（*Sinkehk*，新移民）群集競逐錫礦開採之利而次第開闢的新興礦業市鎮，<sup>③</sup> 如端洛（*Tronoh*）、金寶（*Kampar*）、打捫（*Tambun*）、萬里望（*Menglembu*）等地（附圖2），亦相繼成立以何仙姑為主祀神明的華人廟宇。

- 
- ① Wong Soi Yin, “From Mining Kongsi to Ipoh,” in *Ipoh, My Home Town: Reminiscences of Growing Up, in Ipoh, in Pictures and Words*, ed. Ian Anderson (Ipoh: Media Masters Publishing Sdn. Bhd., 2011), 256-257. 按：Wong Soi Yin 1958年生於端洛，1969年舉家移居怡保。文中關於端洛何仙姑誕的描述，為1960年代的景象。
- ② 廖小青，〈「仙居古廟鎮蠻邦」：拉律戰爭與何仙姑信仰在英屬馬來亞的開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0期（2018年6月），頁47—84。
- ③ 「新客」相對於「土生華人」/「僑生」/「海峽華人」（*Peranakan, Straits-born Chinese*），指的是出生於中國本土，在19世紀中葉以降至20世紀中期之間從中國華南移居南洋的華人移民（*immigrant*）。

在近代馬來亞淘錫熱潮(tin rush)下應運而生的霹靂州眾家何仙姑廟宇中創立於1897年的端洛何仙姑廟，特別值得一書。該廟自肇建以來通貫整個20世紀，不僅是端洛當地華人社會具有最高權威地位的「華族最高機構」，<sup>④</sup>迄今亦保有完整且獨特的儀式傳統。對於當代端洛華人社群而言，每年農曆八月初四日何仙姑誕的建醮與粵劇演出活動，以及每隔十年以賀誕酬神為名擴大舉行的太平清醮，<sup>⑤</sup>是重要性不遜於中國農曆新年的年度盛事。談起端洛何仙姑誕日期間「打醮」與「演戲」的熱鬧歡騰，當地居民往往如數家珍，這是端洛「街坊」迄今仍積極投身參與而鄰近各埠華人甚至印裔民眾亦共襄盛舉的社區傳統。<sup>⑥</sup>

在端洛，以何仙姑廟為中心，為「何大仙姑娘娘」做誕的典故與軼事，是連結馬來亞英屬時期與後殖民階段不同世代華人居民成長生活經驗的重要歷史記憶，一如近代馬來亞各埠核心華人廟宇的週年慶典或神誕例儀，往往反映了廟宇與當地華人社群相互參贊譜寫的地方開拓史。<sup>⑦</sup>然而，現今端洛居民以及周鄰各埠華人民眾言之津津的何仙姑八月誕，實際上並非端洛何仙姑廟本有之神誕例俗，而是遲至1950年代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後期，才首度出現的實踐。相較於慶祝方式於20世紀前期已然明訂於廟宇管理章程的三月誕（按：農曆三月初七日），<sup>⑧</sup>八月

④ 廖小菁，〈「街坊辦事所」：神廟自治組織與英屬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1897—1945）〉，載黎志添主編，《華人廟宇與地方社會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待刊）。

⑤ 「醮」是特定社區或群體在某個擇定的時間，以道士或僧侶等儀式專家為媒介與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社區性祭祀活動，目的是保護該社區或群體，使其由象徵危險、污穢、失序的「陰」處境，恢復為代表安全、潔淨與秩序的「陽」的狀態。在中國珠三角地區與香港，平安清醮俗稱「大醮」、「平安醮」，舉行醮儀俗稱為「建醮」或「打醮」。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10—11；蔡志祥，《酬神與超幽（上卷）：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76—83。

⑥ 粵語「街坊」為里鄰之意，可引伸為同屬一個地方社區的居民全體。

⑦ Tan Chee-Beng,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 Temples and Communitie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8), 13-26.

⑧ 〈（復會）章程〉，載《議案照錄》（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1930年8月10日。按：《議案照錄》為端洛何仙姑廟的管理組織「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Jawatan Kuasa Pengurusan Tokong China Ho Sin Koo）之前身——「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Tronoh Chinese Temple and Cemetery Committee/Pejabat Tokong Dan Perkuboran China, Tronoh）歷年會議紀錄。

誕是直到20世紀中葉才在英殖民當局與馬來亞共產黨武裝鬥爭的陰影下醞釀生成，自始發展而出的地方「新」傳統。

端洛何仙姑廟神誕傳統革變端倪初現的馬來亞緊急狀態，為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至1960之間因應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武裝鬥爭行動所施行的軍事統治。1940年代末期，曾於太平洋戰爭期間與英軍攜手抗日的馬來亞共產黨，揚棄戰後以來的議會政治手段，轉而採取武裝革命路線與英殖民當局進行反殖民鬥爭。1948年6月開始，英方陸續在馬來半島各州屬頒布戒嚴令，馬來亞全區自此進入十餘年的軍事化時期。前後歷時12年的馬來亞緊急狀態，是近代東南亞史、帝國史與冷戰史無法忽略的篇章。九成五以上成員皆是華人的馬來亞共產黨與英殖民政府在二戰後不久即爆發的長期軍事武裝鬥爭，不僅預示了大英帝國在東南亞殖民統治的最終章，同時亦譜寫出馬來亞步向現代化國家的序曲，<sup>⑨</sup>對於當時以新客為主體的馬來亞華人社群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在在影響甚巨。緊急狀態期間，英方為打擊馬共游擊隊後方補給線所施行的畢利斯計畫(Briggs Plan)，<sup>⑩</sup>於馬來亞各州屬總共「創造」了480個「新村」(New Village)，<sup>⑪</sup>受到移殖行動影響的57萬新村人口中，華人比例高達八成六，佔當時馬來亞華人人口總數的三

---

⑨ 1957年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 1948—1963)脫離英國獨立。在英國統治馬來亞的最後10年，殖民當局為因應緊急狀態情勢，進一步擴張與強化軍事、財政與行政職能，政府治理愈益客觀與制度化，亦較二戰前更深入一般民眾的生活，此番發展奠定了現代馬來亞西(modern Malaysian state)的政府架構雛形。T. N.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5-227.

⑩ 即新村政策。分布於叢林邊緣或市郊的農墾地帶、礦區與膠園的華人聚落，是馬共游擊隊尋求物資與金錢補給、蒐羅情報與吸收成員的重點工作地帶。為了切斷馬共與華人民眾的聯繫，1950年起，英殖民當局實行「畢利斯計畫」，將分布於上述地帶的華人居民，強制遷移到特定「移殖區」(Resettlement Areas)集中監控管理，此即後來所謂的華人新村。Kernal Singh Sandhu, "Introduction: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in Ray Nyce,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ed. Shirle Gordon (Singapor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td., 1973), XXXVIII—LI; Karl Hack,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olution and Counterinsurgency at the End of Empi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193-198.

⑪ 此為1954年的新村數目。大部分新村成立於1950年至1952年之間，特別是1951年與1952年局勢最為動盪時期。1954年之後，隨著局勢漸為英殖民當局所掌控，新村數目少有增加。Kernal Singh Sandhu, "Introduction: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XXXIX.

分之一，為馬來亞各族裔中受到該政策衝擊最大的群體。此前學界對於馬來亞緊急狀態，主要著眼於政治與軍事層面的討論，諸如馬共的崛起與發展歷史、<sup>12</sup> 英殖民政府的因應對策、雙方在戰略和戰術上的攻防等軍事行動發展態勢，<sup>13</sup> 以及馬共與英方的軍事鬥爭對於殖民政制的影響等議題。<sup>14</sup> 然而，緊急狀態期間身處兩造政治勢力拉扯之局、身家生計與社會生活皆深受衝擊的一般華人民眾，他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human agency)以及地方華人社區的在地主動性(local initiative)，在傳統政治軍事史研究普遍以國家為中心(state-oriented)的俯瞰(top-down)視角下，猶未能獲得足夠的關注。

緊急狀態脈絡下的華人議題，過去主要嵌附於新村研究。新村是1950年代英殖民政府實行畢利斯計畫對抗馬共叢林游擊戰的產物，該計畫為馬來亞史上由政府主導的最大規模人口移遷行動，全面重塑了馬來半島整體城鄉人口分布比例與聚落型態。<sup>15</sup> 關於新村，研究緊急狀態的政治軍事史經典論著多聚焦畢利斯計畫執行過程對整體戰事和殖民治理的影響，其侷限如前文所述；至於採納田野調查方式進行研究的學者們，早期主要是結合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彙整各州新村考察案例，對於華人新村內部的空間規劃、公設建置以及居民群體的社會結構、族群關係、經濟生活等基本面向，進行綜合性的觀照與分析；<sup>16</sup> 晚近則多是從特定個案出發，透過民族誌書寫，具體展示個別華人新村的在地訊息，讀者可藉此管窺新村居民的實際生

---

<sup>12</sup>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Boon Kheng Cheah,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sup>13</sup> Edgar O'Balance,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1960* (Hamden: Archon Books, 1966); Sir Robert Thompson, *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Experience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Richar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ouchou Yao, *The Malayan Emergency: Essays on a Small, Distant War*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6); Leon Comber, *Malaya's Secret Police 1945-1960: The Role of the Special Branch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08).

<sup>14</sup> Karl Hack, *The Malayan Emergency*.

<sup>15</sup> Kernial Singh Sandhu, "Introduction: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LV-LXI.

<sup>16</sup> Ray Nyce,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活樣況、個人或集體的歷史記憶等。<sup>①⑦</sup>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多數是偏向社會學或人類學進路的共時性研究，或許是受限於文獻材料上的短缺，就歷時性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而言，新村議題仍存在進一步開拓與深化的可能性。<sup>①⑧</sup>舉例來說，新村居民並非無根之民，在被當局強制遷徙至某移殖區之前，他們之中多數都是以特定市鎮為中心的地方華人社區之居民成員。不過，大部分涉及新村的的研究很少進一步探問：新村居民與他們原來所隸屬的社區，在官方強力施行新村政策後，是否還存在聯繫？如若存在，是什麼樣的關係？他們為何與如何維繫或是更新這層關係？

基於上述思索，20世紀中期端洛何仙姑廟神誕傳統革變的案例，或許能在既有關於緊急狀態與新村的的研究基礎上再往前一步。端洛的何仙姑廟祀傳統與儀式實踐，基礎有其來自中國華南原鄉的信仰淵源，對神祇「表揚伸敬」的三月誕賀儀自廟宇肇建以來未曾中斷，<sup>①⑨</sup>體現了近代「華南—南洋<sup>②①</sup>」交流網絡下人員、資本、物質、文化之間緊密的連結和其深遠綿長的影響。<sup>②②</sup>不過，在廟方年年行禮如儀的「正統」三月誕傳統下，何以地方社區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會重複以賀誕之名演繹出另一個嶄新的神誕傳統？

---

①⑦ Lawrence K. L. Siaw,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Centre, 2020); 潘婉明, 《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臺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2005)。

①⑧ 在涉及新村議題的著作中，Francis K. W. Loh 的 *Beyond the Tin Mines*，是少數成功結合文獻與田野調查研究方法的作品。作者交叉運用田調材料、訪談資料、官方檔案與歷史文獻，從華人工農大眾的角度，描繪近打河流域百年(1880—1980)興起與沒落歷程，此間尤為着重1950年代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大批華人新村在霹靂州成立的現象，是能追溯新村居民群體前源來歷並賦予新村歷史飽滿歷史維度與意義的佳作。Francis K. W. Loh, *Beyond the Tin Mines: Coolies, Squatters and New Villagers in the Kinta Valley, Malaysia, C. 1880-19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①⑨ 〈(復會)章程〉，載《議案照錄》，1930年8月10日。

②① 「南洋」以地理疆域而言，約指二戰期間因盟軍劃分戰區之便才開始啟用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臺北：龍視界，2015)，頁4—5。

②②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43-52.

何仙姑的八月「新誕」又何以會在草木皆兵的氛圍中熱鬧登場，並在日後發展成為重要性凌駕三月「舊誕」的實踐？從上述問題出發，本文以霹靂州地方廟宇神誕傳統在1950年代的變革為切入點，試圖在二戰後馬來亞緊急狀態的歷史脈絡下，探討地方上的華人民眾如何透過更新神誕儀式的形式與內容，因應英殖民政府畢利斯計畫的衝擊，藉以重新聚合社群，而此番操作亦成為觸發1960年代以降社區權力結構制度性變革的起點。

## 二、闔埠同心：端洛何仙姑誕的當代展演

闔埠平安，同德同心，維持仙誕。全班公演，有聲有色，做出貢獻。

端洛何仙姑廟戲臺楹聯（1987）

端洛鎮(Tronoh)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Perak)中部近打河(Kinta River)西岸，轄屬近打縣(Kinta)，座落在曾有「世界錫都」之稱的該州首府怡保市(Ipoh)西南方約15英里處。該鎮東北毗靠近打縣治華都牙也(Batu Gajah)，北面鄰接埔地(Siputeh)、布先(Pusing)兩鎮，西南通連督亞冷(Tamjung Tualang)、金寶(Kampar)等近打大埠。端洛開埠於1890年代，在全世界錫產量50%以上都來自英屬馬來半島的20世紀前期，<sup>22</sup> 其不僅是連結當時馬來亞首要錫產區近打河谷地(Kinta Valley)南北兩大行政、商業中心——華都牙也與怡保——的西線陸路要衝，<sup>23</sup> 更是名聞遐邇的錫礦業重鎮：該鎮為全球最大露天開採(open-cast)礦場所在地，1920年代之前錫米出產總額位居世界第

<sup>22</sup> 〈馬來亞之錫米出產〉，載中華民國外交部情報司編，《國外情報選編》，第171期（1937年），頁46—47；丘思東編，《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金寶：近打錫礦工業博物館，2015），頁169—172。

<sup>23</sup> 端洛為馬來聯邦鐵路支線——怡端鐵路的終點。怡端鐵路全長15英里，首站為怡保，途中行經近打河西岸7個礦業市鎮：華林(Falim)、萬里望(Menglembu)、拿乞(Lahat)、甲板(Papan)、布先、埔地(Siputeh)、端洛。劉煥燃，《英屬馬來亞概覽》（新加坡：新國民日報，1935），頁105—107。

一、執近代馬來亞錫礦業牛耳的端洛錫礦公司(Tronoh Mines, Ltd.)，正是20世紀伊始由此發跡。<sup>24</sup>

「世界產錫之富，無如怡保，若端洛一帶，尤可稱無量數之寶庫。」<sup>25</sup>端洛在20世紀上半葉因錫礦業榮景而聲振寰宇。<sup>26</sup>一個世紀以來主宰端洛埠歷史脈動的華人居民，現今主要分布於市區(Tronoh Town)、紅毛壠(Tronoh Mines)、那拉新村(Kampung Baru Nalla)與百利新村(Kampung Baru Bali)等四大區域。(附圖3)市區是端洛全埠最早群聚人口的行政、商業中心，其大致的範圍為「大街」(Jalan Besar)與「新街」(Jalan Baru)兩條街道所構成的丁字型街區。端洛市區與霹靂州大多數因錫礦業而興起的城鎮相似，除了主要由華人所經營的商鋪、餐館，亦林立各類華人結社會所，例如中山學校校友會、<sup>27</sup>馬華公會、何仙姑廟委員會，以及近代移居當地的中國粵籍移民所創的地緣性社團，如增龍會館、古岡州公會、南番順公會、會寧同鄉會、廣西善心所等。<sup>28</sup>

辦公議事會所設置於新街門牌24號的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Jawatankuasa Pengurusan Tokong China Ho Sin Koo)，是市區一眾華人社團會所中僅有的「宗教」機構，<sup>29</sup>其所轄理的端洛何仙姑廟，奉「何大仙姑」為主神，草創於1897年，與端洛開埠在時間上幾無先後，1902年的重修工事奠定了基本的廟貌輪廓。<sup>30</sup>何仙姑廟並未與廟委會相偕廁身市井，而是遠離民居，矗立於

<sup>24</sup>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Ipoh: Perak Academy, 2005), 80. 按：端洛錫礦公司其後在馬來半島各地開辦礦場，逐漸發展成為馬來(西)亞執牛耳之礦業集團。

<sup>25</sup> 黃強，《馬來鴻雪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上冊，頁127。

<sup>26</sup> 傅紹曾，《南洋見聞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1923)，頁26；林穆群，《馬來半島商埠考》(新加坡：南洋工商補習學校，1928)，頁55。

<sup>27</sup> 現今全名為「端洛國民型中山華文小學校」，是端洛最早的華文學校。

<sup>28</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尚有花縣會館，戰後搬遷至怡保。朱宗賢，《怡保城鄉散記》(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7)，頁76；訪談紀錄：鄧○光，2016年4月13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sup>29</sup> 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於1991年正式註冊成立，辦事處設於端洛華人大會堂，1992年遷至新街現址。「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傳單)」，1991年4月29日，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訪談紀錄：鄧○宙，2016年9月5日，於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

<sup>30</sup>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97, 959; 何仙姑廟門匾，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孟冬立，端洛何仙姑廟藏；朱宗賢，《怡保城鄉散記》，頁78。

大街街尾、鄰近市區南面與那拉新村交會的礦湖畔邊地。兩個甲子以來，該廟作為端洛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是當地華人居民的信仰中心，亦是端洛華人義山的管理機關，何仙姑廟委員會的前身——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 (Tronoh Chinese Temple and Cemetery Committee / Pejabat Tokong Dan Perkuboran China, Tronoh)，<sup>③①</sup> 主理端洛何仙姑廟與華人義山相關事務之餘，英屬時期更是當地華人居民俗稱的「街坊辦事所」，仲裁統籌與該埠華人相涉之公共事務，為端洛所有華人社團中地位最崇高的組織，對於當地華人公眾事務具有關鍵性的話事權。<sup>③②</sup>

端洛華人敬奉的「何大仙姑」，據稱是中國唐朝生長於廣東增城的何姓人家之女。<sup>③③</sup> 在端洛，「何大仙姑娘娘」每年有兩個神誕日：一是農曆三月初七正誕，為何仙姑「實際」的生辰；另一是農曆八月初四成道誕，據說為其羽化飛昇的日子。<sup>③④</sup> 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一般為神明做誕重視正誕的常例，現今在端洛，地方居民並不會在三月初七日舉行大規模慶賀活動，除了何仙姑廟委員會的理事與幹部職員當天會在廟中舉行簡單的祝壽儀式，平常少去廟裡走動的人，多半不知道有這個誕日。相較於此，每年農曆八月初四成道誕，以及由此衍生的十年一屆「千秋寶誕平安大醮」，則廣為民眾知悉，不僅是埠上華人居民積極籌備和參與的年度盛事，誕期之間的粵劇演出與建醮活動，亦吸引了近打河谷西岸一眾市鎮以及四方信士共襄盛舉，共同鋪演出端洛一年一度甚或十載才得一遇的地方盛事。

③① 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成立於英屬時期，與廟宇一體，在當時屬於豁免註冊的社團。1991年，辦事所以「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之名，正式向政府註冊。〈新舊職員交卸會議〉，載《古廟義塚辦事所議案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1991年3月16日。按：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的會議紀錄自1968年起，由《議案照錄》更名為《古廟義塚辦事所議案部》。

③② 英屬時期的古廟義塚辦事所除了負責處理端洛何仙姑廟與華人義山的經營管理事宜之外，也是端洛華人社群全體公意的代言人以及地方社區公共事務的裁決者和落實者，例如地方基礎建設的維繫、礦區採礦爭端的仲裁、代表華人社群與政府當局進行交涉、動員組織居民完成來自祖籍國與殖民政府臨時編派的工作任務等。有關辦事所的組織結構與職能角色，見廖小菁，〈「街坊辦事所」：神廟自治組織與英屬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1897—1945）〉，待刊。

③③ 廖小菁，《綴織仙名：何仙姑信仰與廣東增江流域地方社會（960—186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頁43—106。

③④ 訪談紀錄：洗○燕、陳○嬌、瓊姐，2016年4月13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 (一) 凡有聖誕，禮宜祝賀<sup>35</sup>：三月誕的例行之儀

端洛何仙姑的農曆三月初七正誕日，通常在清明前後，此時埠上華人居民正在進行個別家戶或社團的春祭拜山活動。三月初七當日，何仙姑廟委員會（以下簡稱「廟委會」）的正、副主席暨職員，以及廟委會中的端洛市區、那拉新村、百利新村、紅毛壠等四區代表理事，<sup>36</sup> 依例會在上午9時集合於廟中舉行賀誕儀式。<sup>37</sup> 2016年4月13日（農曆丙申年三月初七日）的祝壽典禮，在上午9:15開始，全程大致於20分鐘內完成。儀式流程依序分為上香、上供、宣讀賀文、獻紙衣元寶等幾個部分：（1）廟委會全體包括正、副主席與各區代表、幹部職員，一齊上香三拜；（2）端洛市區主席（通常為廟委會主席代表）向神明敬茶，市區副主席（通常為廟委會副主席代表）敬酒，那拉代表敬奉雞、魚、豬三牲，百利代表敬奉果品，紅毛壠代表敬奉鮮花；（3）司儀以廣府話（按：當地俗稱「白話」）宣讀賀文（賀文內容見附錄1）；（4）廟委會主席敬獻衣紙元寶。賀誕儀式最後在全體理事職員行三鞠躬禮、司儀宣告禮成後，正式結束。

### (二) 遇聖誕而演戲<sup>38</sup>：八月誕的籌備與演戲酬神委員會

端洛街坊熟知的「何大仙姑娘娘千秋寶誕」，即農曆八月初四成道誕，是全埠華人集體動員的年度大事。清明之後，為仙姑娘娘慶壽的一系列籌備工作便陸續展開。每年陽曆4月中旬至5月底之間，廟委會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以下簡稱「演酬會」），專責操

<sup>35</sup> 語出「（三月初七日）何仙姑寶誕賀文」，手鈔本未註明抄錄時間，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sup>36</sup> 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現今共有30席理事，包括6席團體理事、24席個人理事，每屆廟委會理事任期兩年。團體理事由當地華人公共社團輪流充任，各社團自行推派一名代表擔任理事。24席個人理事由端洛居民或商號透過選舉出任，其中，端洛市區佔12席，那拉、百利、紅毛壠三區則各佔4席。廟委會的主席、副主席和主要職員，如總務、副總務、財政、交際、巫文書等，由30名理事中選出，皆不支薪。《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議案部》，1997年3月17日、2001年3月30日；「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2015年至2016年職員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訪談紀錄：鄧○宙、洗○燕，2016年4月13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sup>37</sup> 《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議案部》，1993年6月2日、2003年5月12日。

<sup>38</sup> 語出「（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賀文」，手鈔本未註明抄錄時間，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辦當年農曆八月誕期的所有活動。<sup>39</sup> 每屆演酬會最遲會在當年6月初之前成立，9月或10月誕期活動結束後，<sup>40</sup> 演酬會需將整理完成的誕期帳目資料呈交廟委會審核，經廟委會核對無誤並辦妥相關交接事宜之後，召開「演戲酬神委員會結束會議」宣告演酬會解散。按照慣例，上述工作必須於11月之前完成。<sup>41</sup>

廟委會全體職員是演酬會此一特別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其角色職能與他們原本於廟委會的職務相互呼應，如正副主席、總務、財政、婦女、交際、中英文書、會計、衛生與查數等，特別是廟委會現任的主席、總務與財政。<sup>42</sup> 此外，根據神誕工作的實務需要，演酬會另外設置了不同的工作小組：主席團、總務組、燒衣組、布置組、招待組、燈光組、募捐組等。<sup>43</sup> 其中，在主席團、總務、燒衣、布置、招待、燈光這些小組中，市區、那拉、百利、紅毛壠四區居民各自擁有一位代表。以主席團和總務組為例，除了廟委會的正、副主席為必然成員，另外設4名副主席，由四區各自推派1位代表出任；至於燒衣、布置、招待、燈光各組則分設4名成員，為四區各自推派1人擔任。<sup>44</sup>

每屆演酬會在該年首場召開的會議中，需完成3項核心任務：一是進行任務分工，二是討論該年慶祝神誕的方式，三是提出並議決當年演戲酬神各項支出的預算案。任務分工決定了當屆演酬會的組織架構、人力安排與財務收支。關於神誕的慶祝方式，歷來皆是以兩種活動為主軸：一是演戲，二是建醮。<sup>45</sup> 演戲，是慶賀仙誕、酬謝神恩的核心主軸，<sup>46</sup> 也是一般民眾最踴躍

<sup>39</sup>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1997年4月29日、1998年4月16日、1999年4月22日、2000年4月5日、2001年5月24日、2002年4月18日、2003年5月2日、2004年4月19日、2005年5月24日、2006年3月31日、2007年5月12日。按：《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為歷年演戲酬神委員會籌辦何仙姑八月誕期活動過程的會議紀錄。

<sup>40</sup> 農曆八月通常是陽曆9月，遇閏年則可能為10月。

<sup>41</sup>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1997年4月29日。

<sup>42</sup>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2000年5月2日。

<sup>43</sup> 近年因為在誕期間新增了歌唱比賽節目，陸續設置了票務組、交通組與歌唱組。

<sup>44</sup>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1997年4月29日；「端洛何仙姑廟2016年演戲酬神委員會職員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sup>45</sup>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1998年4月16日、1999年4月22日、2000年4月5日、2001年5月24日、2002年4月18日、2003年5月2日、2004年4月19日、2005年5月24日、2006年3月31日、2007年5月12日。

<sup>46</sup> 這是操辦神誕相關事宜的特別委員會以得名的由來。

參與的節目，因此地方上慣以「演戲酬神」泛稱每年神誕的全部活動。<sup>④⑦</sup>所謂「演戲」，主要指聘請粵劇團出演廣府大戲。擔綱「演戲」要角的粵劇團承擔酬神重任，其表現之良窳，往往是全埠居民品評當年神誕活動成功與否的焦點之一。年度演酬會在籌組之初，便會透過提名和投票表決的方式選出當年度出演的戲班。此外，當代的「演戲」，廣義上還包括目前時興的「歌唱/唱歌」活動，內容主要是雇請歌劇團表演、舉辦歌唱比賽。從八月初四正日下午戲班首次登臺，一直到八月十四中秋節前夕，其間粵劇大戲、歌唱比賽與歌舞表演次第輪番舉行，仙姑廟前的戲臺往往笙簫不輟十餘日。

建醮，亦即當地人俗稱的「打醮」<sup>④⑧</sup>、「念經」，是誕期系列活動中除了「演戲」之外的另一主軸。八月初四誕日的打醮活動，依規模而論可分為兩種：一是例行於每年農曆八月初四日的醮儀，地方上俗稱「小醮」，歷時一晝一宵；二是每十年擴大舉辦的太平清醮，為「大醮」、「平安醮」，舉行時間為當年農曆八月初一至初四日，歷時四宵三晝。承醮喃嘸師傅人選以及打醮的預算、天數與法事規模（三元、五元或七元壇），皆須事先經過演酬會理事開會討論與決議。<sup>④⑨</sup>演酬會的燒衣組，即是特別針對建醮相關的祭祀事宜而設置，其主要工作包括事前接洽承醮的喃嘸師父、訂製建醮所需紙紮用品、<sup>⑤①</sup>在打醮期間備置供品等等。小組成員在誕期中協助喃嘸師傅進行儀式，並專責安排、協調與指導本埠居民或外埠信士參與喃嘸棚外的祭祀活動。

隨著誕期日近，演酬會在農曆七月舉行籌募「戲金」<sup>⑤②</sup>、「洗廟」兩項活動，正式為誕日打醮的準備工作揭開序幕。戲金籌募通常歷時兩週左右，期間演酬會成員不僅會在端洛本埠進行神誕的公開募款，亦會依日前往鄰近外埠如華都牙也、甲板、埔地、布先、督亞冷、民萬新村等地募捐。每年演酬會決議募捐的行程與路線後，會提早於上述各埠代表性華人廟宇（按：地方俗謂「街坊廟」）公告。<sup>⑤③</sup>「洗廟」是打醮前地方居民齊力整理廟宇內外

④⑦ 例如，廟委會常以籌募「戲金」之名義，對外募集辦理神誕所需經費。《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2005年7月19日；「端洛何仙姑廟2016年演戲酬神委員會籌募戲金行程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④⑧ 關於廣府傳統的打醮流程和醮儀內容，可參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頁26—58。

④⑨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2001年6月7日、2006年6月13日。

⑤① 如大士公、佛船、寶馬、閻王、判官等。

⑤② 泛指辦理神誕所需的經費。

⑤③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2005年7月19日；「端洛何仙姑廟2016年演戲酬神委員會籌募戲金行程表」。

與周遭環境所進行的大掃除工作。洗廟通常是在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過後，由演酬會婦女組成員集體赴廟向何仙姑問杯擇日後進行。<sup>53</sup> 洗廟當日，除了清潔廟容，還包括後續為何仙姑神像「化妝」以及「更衣」，<sup>54</sup> 碰觸神像的核心儀式必須由未出嫁的「花女」執行，<sup>55</sup> 過程中廟門關閉，唯有「乾淨」的女性能待在廟中。<sup>56</sup> 值得一提的是，在「更衣」儀式中為神像更換的神衣，歷來必須是從廣州或香港訂製。<sup>57</sup>

### （三）值良辰以建醮<sup>58</sup>：八月誕醮儀的踐行梗概

#### 1. 小醮：常年例行醮儀

在尋常年度的農曆八月演戲酬神活動中，全部醮儀會在八月初四日當天完成。八月初四日上午9時左右，當承醮的喃嘸班於廟外準備開壇事宜時，演酬會人員會於先前在廟中集合舉行團拜，由司儀宣讀祝壽賀文，前後流程一如三月初七正誕。醮儀依實施的時間，分為晨間的日醮（9:00 AM ~ 1:00 PM）和晚間的夜醮（7:00 PM ~ 12:00 AM）。日醮通常於上午9時開始，下午3時前結束，由3位喃嘸師傅與1位樂師一起進行法事，整場法事大致可分為以下4個階段：（1）豎幡、請陰神（9:00 AM ~ ）；<sup>59</sup>（2）開壇、開光（10:00 AM ~ ）；（3）開榜（11:30 AM ~ ）；（4）接斗神、旋星轉運（1:00 PM ~ ）。醮儀的過程往往與「演戲」相互搭配唱和，在戲班開演「八仙賀壽」劇目之後，喃嘸師傅於下午1時左右進行接斗神、旋星轉運等法事。

<sup>53</sup>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1996年8月19日；訪談紀錄：洗○燕，2016年4月13日，於端洛何仙姑廟。按：近年來多於農曆七月期間擇一週日舉行。

<sup>54</sup> 「化妝」是為神像重新妝點上色的儀式，每年舉行一次。「更衣」是為神像更換新冠冠的儀式，每三年舉行一次。

<sup>55</sup> 「花女」指未曾婚嫁的女性，男性則為「花仔」。

<sup>56</sup> 「乾淨」指家中沒有喪事且不在月事期間。

<sup>57</sup> 《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議案部》，1993年4月2日、1993年9月3日、2000年2月29日，2003年4月6日；訪談紀錄：洗○燕，2016年4月13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sup>58</sup> 語出「（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賀文」，手鈔本未註明抄錄日期，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sup>59</sup> 豎幡、請陰神，是喃嘸師傅在廟埕東側盡處之外，豎立懸掛6個燈籠的長竿，燈籠上書著有「華旛赦罪大天尊」字樣，接着進行「請陰神」儀式，即為事先擺設就位的大士爺、佛船、火船、寶馬等紙紮公仔開光。

夜醮於晚間7時開始，凌晨12時左右結束，全場法事由喃嘸班全體5位喃嘸師傅暨樂師一同進行，主要分為5個部分：（1）朝幡（7:00 PM ~）；<sup>⑩</sup>（2）放水燈（8:40 PM ~）；（3）解天願（9:30 PM ~）；（4）破地獄（10:30 PM ~）；（5）上幽臺、超幽、化大士爺（11:15 PM ~）。晚間9時左右，演酬會燒衣組人員、喃嘸班以及當地居民，群集於戲臺後方流向舊礦湖的小溪邊，舉行放水燈儀式。事畢，喃嘸班進行解天願和破地獄的儀式。晚間11時，醮儀過程中使用的大型紙紮公仔如大士爺、佛船、火船、寶馬等，被遷移至神廟山門牌坊圍牆之外的空地集中安放、圍以紅燭，待喃嘸師傅完成超幽儀式，便會點燃火化，完成一整天的演戲酬神、建醮祭幽的全套儀式。在上述一連串醮儀法事進行過程中，粵戲班的演出亦在何仙姑廟戲臺上同時進行，「六國大封相」等大眾耳熟能詳的劇目與喃嘸班師傅施作的儀式彼此唱和，融匯成整個慶賀仙誕、普濟群幽的熱鬧場景。

## 2. 大醮：2016丙申年平安清醮的觀察

端洛何仙姑廟八月誕的年度例行建醮活動，每十年便會以太平清醮的形式擴大舉辦。<sup>⑪</sup>以1956年為首屆起算，2016年9月落幕的第七屆大醮（丙申大醮），距離最初端洛建平安醮之期，剛好滿一甲子。

2016年8月1日至16日（丙申年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十六）戲金籌募與8月7日（七月初五）洗廟，揭開了第七屆大醮序幕。除了端洛本埠四區華人居民積極參與，甲板、埔地、布先、華都牙也、民萬新村、督亞冷等地的外埠善信，一如既往踴躍捐貲「幫襯」此一盛事。<sup>⑫</sup>橫跨農曆七月的1個月前置工作甫一結束，十年一度的何仙姑娘娘千秋寶誕大醮，就此於2016年9月1日（丙申年八月初一）正式展開。

9月1日至4日（八月初一至初四）為正式醮期，即當地人所謂「念經」的日子。大醮頭兩日每日晌午與傍晚（八月初一、初二，12:00 PM ~ 2:00 PM；5:00 PM ~ 7:00 PM），演酬會於何仙姑廟戲臺前空地，為來廟大

⑩ 朝幡，是喃嘸師傅帶領演酬會成員從廟步行至上午9時豎幡的位置，進行焚香燒紙、唱懺祭祀的醮儀。

⑪ 訪談紀錄：馮○基，2016年9月1日，於端洛何仙姑廟；訪談紀錄：伍○忠，2016年9月4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⑫ 《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2005年7月19日；〈端洛何仙姑廟2016年演戲酬神委員會籌募戲金行程表〉。

眾提供免費齋宴。<sup>63</sup> 第三日（八月初三）除了午間的免費流水席齋飯，<sup>64</sup> 演酬會會於晚上7時左右在禮堂舉辦葷食晚宴，<sup>65</sup> 除了廟方邀請的貴賓以外，有意赴宴的端洛居民及其來自外埠的親友，皆須購票才得參與。宴會期間主要的節目是頒獎典禮，由廟委會頒發獎學金予當地成績優秀的學子。

喃嘸師傅的「念經」行程，開始於9月1日（八月初一）晚間7時。當日下午，承醮的喃嘸班會於仙姑廟東側廟簷下的廟埕空地啟建道壇。今次承醮的喃嘸班，包括5名來自怡保的喃嘸師傅以及1名來自檳城的樂師。在醮儀正式開始之前，喃嘸班師傅與演酬會工作人員，會先行在以下地點舉行「揚旛」儀式：<sup>66</sup>（a）廟外；<sup>67</sup>（b）市區通往仙姑廟的路口；（c）那拉新村村口；（d）市區連外主幹道（Jalan Tronoh）與怡保—紅土坎公路（Lebuhraya Ipoh-Lumut）的交會口；<sup>68</sup>（e）紅毛壠村口。晚間7時整，醮儀正式開始。喃嘸班全體在召集五方神魂和開壇請聖後，帶領演酬會主要職員、端洛四區代表，以及擔任本屆大醮「榜首」、「榜尾」的兩名長者，<sup>69</sup> 從仙姑廟乘車出發，依序前往上述b、c、d、e、a等地進行「朝旛」儀式。<sup>70</sup> 全部地點朝旛完畢後，接續的是開光大士棚的大士爺以及其他陳列在廟門前庭的紙紮佛船、火船、金剛、判官等。晚間9時3刻進行開經禮懺，事畢，第一日的醮儀暫時告一段落。

9月2日（八月初二）與9月3日（八月初三）的醮儀亦分為晨間的日醮（9:00 AM ~ 1:00 PM）和夜間的夜醮（7:00 PM ~ 12:00 AM）。9月2日的日醮包括4個部分：（1）早朝行道（10:30 AM ~ ）；（2）誦經禮懺

<sup>63</sup> 齋宴的準備是在演酬會組織下，由在地居民義務參與幫忙，不假外包。

<sup>64</sup> 中午的齋宴平均每場有1200~1500人用餐（一次席開40~50桌，每桌10人，輪3次左右），傍晚參與齋宴的人數會少一些，平均每場有1000~1200人左右。

<sup>65</sup> 葷食晚宴由演酬會委託外間的餐廳操辦，本次委辦餐廳為百利新村祥珍酒家。

<sup>66</sup> 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頁42。

<sup>67</sup> 喃嘸棚及其東側供奉大士爺與「當境受食男女孤魂由子等眾」牌位的大士棚之間的空地。

<sup>68</sup> 揚旛的具體位置在端洛衛生所（Klinik Kesihatan Tronoh）前方草坪。從市區到百利新村必須經過這個路口。

<sup>69</sup> 「榜首」、「榜尾」在象徵意義上為端洛全體社區成員的代表，原則上必須是家中四代同堂且至今沒有任何成員殘缺傷亡的長者，才有資格列名。

<sup>70</sup> 醮期期間每日10:30 AM與7:00 PM，朝旛儀式由原班人馬按照上述程序、地點依序重複施作，晨間進行的朝旛亦名為「早朝行道」、晚間為「晚朝行道」。傳統上朝旛必須步行，晚近改為以車代步。《端洛何仙姑廟演戲酬神委員會議案部》，2006年5月16日。

(12:00 AM ~)；(3) 開光龍虎榜(1:15 PM ~)；(4) 誦經祈福(2:15 PM ~)。夜醮則包括3個部分：(1) 晚朝行道(7:00 PM ~)；(2) 散花息恨(8:45 PM ~)；(3) 沐浴攝召(9:45 PM ~)。根據筆者的觀察，八月初二全日醮儀中，以日醮中的「開光龍虎榜」——公開張貼並開光〈慶賀聖誕集福榜文〉(榜文內容見附錄2)，最受大眾關注。〈榜文〉最初由喃嘸師傅貼出時，立刻引起在場群眾的圍觀，多人甚至逐字細讀。不出一刻，即有演酬會數名成員發現錯處，提醒喃嘸師傅需要在〈榜文〉內容起首、結尾處添補上當屆大醮擔任「榜首」、「榜尾」人士的姓名。開光儀式在此番修改之後才順利進行。由〈榜文〉中「上奉金闕高真」、「下超孤幽等眾」等文字可知，以慶賀聖誕為名舉行的十年大醮儀式活動，除了為社區全體成員祝賀何仙姑聖誕以祈福佑，同時附加了「施食超幽」的功能與意義，集慶賀仙壽與普濟幽冥於一體。

9月3日(八月初三)日醮包括4個部分：(1) 早朝行道(10:30 AM ~)；(2) 延生禮懺(12:00 AM ~)；(3) 延生禮斗(1:15 PM ~)；(4) 轉大鴻運(2:15 PM ~)。至於夜醮，則包括3個部分：(1) 晚朝行道(7:00 PM ~)；(2) 解天願(8:45 PM ~)；(3) 大破沙籬地獄(9:45 PM ~)。初三日活動的高潮部分有二，一是在當日席開121桌的晚宴中，廟委會頒發埠上優秀學子獎學金的頒獎典禮；二是喃嘸師傅在晚宴結束後所舉行的破地獄儀式，過程中精彩的刀劍火舞，吸引了眾多當晚赴宴民眾的圍觀。

9月4日(八月初四)，為何仙姑誕辰正日。在喃嘸班到廟舉行日醮之前，演酬會成員早早齊聚於廟中，準時在上午9時舉行團拜，為仙姑娘娘祝壽。儀式程序與數月前的三月初七正誕儀典，基本一致。首先是集體上香：演酬會全體職員包括市區主席、那拉新村主席、百利新村主席、紅毛隆區主席與各區職員，一齊向何仙姑神像上香三拜。接着是依次上供：端洛市區主席向神明敬茶敬酒，那拉新村主席敬三牲，百利新村主席敬菓品，紅毛壠區主席敬鮮花。最後，則是進入典禮的核心部分，即司儀宣讀賀文(附錄3)。賀文讀畢，在演酬會主席敬上元寶、全體職員行三鞠躬禮之後，社區代表的此番祝壽儀式禮成。此時，喃嘸師傅亦開始當日的醮儀。

按照喃嘸師傅的原定目次表，9月4日的日醮儀式分為4個部分：(1) 早朝行道(10:30 AM ~)；(2) 祈福禮懺(12:00 AM ~)；(3) 釋放飛潛(1:15 PM ~)；(4) 誦經消災(2:15 PM ~)。夜醮亦包括4個部分：(1) 晚朝行道(7:00 PM ~)；(2) 普施水幽放水燈(8:45 PM ~)；

(3) 施放玉山普施大幽 (10:15 PM ~ ) ; (4) 奉送大士爺 (12:00 PM ~ )。然而，當天原本安排在日醮流程的「釋放飛潛」，即放生鳥雀（飛禽）和龜（潛獸）儀式，最後則合併到夜醮「普施水幽放水燈」和「施放玉山普施大幽」，一同於夜間8時左右開始進行。放水燈是醮期間與祭幽有關的法事中，當地民眾自發性參與程度較高的活動之一。除了演酬會成員外，鎮上許多居民亦隨喃嘸師傅和演酬會成員來到小溪邊，進行各自的祭祀儀式。放水燈與放生的儀式結束後，喃嘸師傅稍事休息，與全體社區成員一同於11時左右準備「奉送大士爺」。初四日的最後醮儀，也是整個2016年端洛何仙姑廟十年大醮的最終章，在全體參與人員共同火化大士爺與四大金剛的火光中結束。

### 三、「表揚伸敬」之「舊例」：1950年代中期前的誕儀傳統

古廟何仙姑寶誕，定例夏曆三月初七日，每逢是日有賀誕之舉。

〈古廟義塚辦事所規例〉（1930）<sup>①</sup>

現今於端洛簡約行事的三月誕，無論是慶賀儀式規模或是知名度，皆遠不及八月誕，然而，就誕儀實踐的歷史而言，三月誕是歷來唯一在廟宇管理章程中明訂施行例則的何仙姑誕俗，更是端洛何仙姑廟初立迄今未曾中斷過的儀式傳統。1930年7月底，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的前身——「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以下簡稱「辦事所」）在經歷一場惡火後重新復會，<sup>②</sup> 彼時重新議訂的復會章程〈古廟義塚辦事所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四條，即開宗名義確立年度「表揚伸敬」廟宇主祀神祇何仙姑的賀誕規制，包括寶誕日期、賀誕方式與供品種類等：

① 〈古廟義塚辦事所規例〉，載《議案照錄》，1930年8月10日，條4。

② 〈全體會議〉，載《議案照錄》，「失損火災事」，1930年7月27日。按：辦事所早期文獻紀錄大多煙燼於1930年7月這場火災，然而，根據這份復會後的首次會議紀錄可知，此一以何仙姑廟祀傳統為核心所衍生的廟宇暨公塚管理組織，至遲在1930年就已是端洛地方上頗具規模的社團組織。

古廟何仙姑寶誕，定例夏曆三月初七日，每逢是日有賀誕之舉。只辦八音一班一晝二宵，<sup>73</sup> 備辦生花、鮮果、三牲，表揚伸敬，此款由公支給。<sup>74</sup>

1930年〈規例〉主要沿襲「舊例」即失火前該會舊有章程內容。<sup>75</sup> 根據〈規例〉「古廟何仙姑寶誕，定例夏曆三月初七日」之語，以及該年農曆三月辦事所的帳簿紀錄，<sup>76</sup> 可知廟方於農曆三月初七日為何仙姑行「賀誕之舉」的慣例由來已久。此外，〈規例〉言明該誕儀花費款項「由公支給」，相較於20世紀前期另外兩項慶祝方式亦詳載於章程的節日典儀：孔聖寶誕和雙十節，上述節慶活動雖然皆是由辦事所代表全體端洛華人居民負責組織籌辦，不過，唯有何仙姑寶誕的花銷，是無限額度由辦事所全額支付。<sup>77</sup> 以翌年三月初七日各項賀誕支出紀錄為例，可以管窺三月誕在二戰前大致的實踐樣貌，同時也顯示廟方確實依循〈規例〉條陳的原則操辦誕儀。（見附表1）

無論是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期間，抑或戰後因英殖民政府與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鬥爭而燎延整個1950年代的馬來亞緊急狀態，每逢農曆三月，辦事所依然勉力克服萬難，如時操辦誕儀祭禮。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在當地華人日後所謂「蝗軍」肆虐的日佔時期，<sup>78</sup> 辦事所停止一切明面上的議事活

<sup>73</sup> 八音班興起於清末民初，民國時期盛行於廣東珠江三角洲與香港，樂手主奏樂器為嗩吶及各種敲擊樂器，如高邊鑼、小鈸、扁鼓等，表演形式可分坐樂與行樂兩種，多見於官府的公務活動以及民間神誕、齋醮和紅白二事等。陳子晉，〈香港吹打樂：聽而不聞的本土文化〉，2020年5月16日，<https://reurl.cc/3a2rp0>。

<sup>74</sup> 〈古廟義塚辦事所規例〉，載《議案照錄》，1930年8月10日，條4。

<sup>75</sup> 〈全體會議〉，載《議案照錄》，1930年8月10日。

<sup>76</sup> 「支古廟賀誕八音一班，去48元；支古廟賀誕什物，去61.6元」，《古廟義塚進支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1930年4月6日。按：《古廟義塚進支部》為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歷年收支紀錄。

<sup>77</sup> 慶祝孔誕的經費來自辦事所對埠上商戶募款；慶祝雙十節活動的花費，辦事所規定補助上限為50元。〈古廟義塚辦事所規例〉，載《議案照錄》，1930年8月10日，條5、條6。

<sup>78</sup>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並同步展開南方作戰計畫(Southern Operations)，進攻美、英、荷等國在東南亞的屬地，太平洋戰爭全面引爆。日軍從馬來半島北部發動攻勢，北馬大城檳城、太平、怡保於該月下旬相繼失守，近打諸埠逐一淪陷。1942年2月，駐新加坡英軍向日軍投降，馬來半島全境成為日本佔領區。〈馬來日軍順利發展檳榔嶼全部被佔領〉，《江蘇日報》，1941年12月22日，版1；王賡武著，林紋沛譯，《家園何處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60；〈馬來霹靂省首邑怡保城昨陷落〉，《新聞報》，1941年12月30日，版3；〈自怡保南進之日軍抵達巴都牙加（按：即華都牙也）〉，《新聞報》，1942年1月1日，版4。

動，不過，每年三月初七日的何仙姑誕，仍舊在廟中如期舉行，只是在形式和規模上轉趨精簡，相較於戰前行事，最大的差異在於減省了八音班的娛慶安排。<sup>79</sup> 戰後，隨著大英帝國重返馬來半島，辦事所因日佔而中斷了數年的議事慣例，於1946年農曆新年後重新恢復。<sup>80</sup> 該年3月，復員後頭一場辦事所全體職員會議的討論焦點之一，即是日後何仙姑誕的辦理方式。當時會中決議，「何仙姑誕亦按照舊例而行」，<sup>81</sup> 所謂「舊例」，即是依循戰前之慣例，於三月初七日備辦生花、鮮果、三牲，並雇聘八音班，行慶賀之儀。

1940年代晚期，馬來亞共產黨與殖民政府之間的武裝鬥爭轉趨白熱化，英方於1948年6月起陸續於馬來亞各州屬與皇家殖民地新加坡，頒布戒嚴令即《緊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sup>82</sup> 正式展開一系列肅清馬共勢力的軍事行動與政策。1950年開始，隨著馬共與殖民政府兩造鬥爭情勢的升高，為了有效切斷馬共游擊隊與華人社群的物質—情報—人員關係網絡，馬來亞軍事行動指揮官畢利斯將軍(Sir Harold Briggs, 1894—1952)將居住於市郊或叢林邊緣的農墾地帶、礦區與膠園的華人居民，強制遷移到特定「移殖區」(Resettlement Areas)集中監控管理，為「畢利斯計畫」。其中，華人人口眾多的霹靂州，由於其特殊的地理與產業環境，遼闊山地叢林與河川谷地錯落間廣布富裕的錫礦場、膠園，歷來是馬共游擊隊活動最活躍的地區，為1948年率先進入「緊急狀態」(Emergency)的州屬。<sup>83</sup>

<sup>79</sup> 《古廟義塚進支部》，「仙姑誕用去16.8元」，1943年4月11日（昭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古廟義塚進支部》，「仙姑誕用去14.63元」，1944年3月30日（昭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古廟義塚進支部》，「東棧對仙姑誕○○單去79.1元；仙姑誕對公蕉（香蕉）、餅仔去10.5元」，1945年4月18日（昭和二十年三月初七日）。按：東棧位於端洛市區，為販售油米雜貨與食品、罐頭的商行。徐雨郊、高夢雲編，《南洋四州府華僑商業交通錄》（怡保：光明印務局，1928），頁60。

<sup>80</sup> 〈全體職員大會議〉，載《議案照錄》，1946年2月16日。

<sup>81</sup> 〈全體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1947年3月16日。

<sup>82</sup> 《緊急法令》頒布之主要目的如下：一是授權軍警在未經審判或授權的情況下全面拘留、搜查任何涉嫌從事共黨活動的民眾；二是施行宵禁；三是對於非法持有武器彈藥者處以死刑，此外還包括宣告共產黨及其他左翼政黨、團體為非法組織，將干擾聯合邦安全者驅逐出境等。Karl Hack, *The Malayan Emergency*, 80-81.

<sup>83</sup> 1948年6月16日，怡保以北20英里處的和豐埠(Sungei Siput/Sungai Siput)爆發3名歐洲籍橡膠園經理人為華裔馬共成員槍殺事件。當日怡保西北的太平與南馬柔佛州(Johore/Johor)首府新山(Johore Baru/Johor Bahru)附近，亦分別發生兩起華籍膠園包工頭為馬共謀殺的命案。由於和豐命案的受害者為歐籍，獲得英方高度重視，學界一般視此事件為馬共與英殖民當局鬥爭白熱化之始點。

1950年代初期，在畢利斯計畫的施行下，原本散居於端洛市區新舊街場範圍之外郊區與各個「港門」聚落<sup>84</sup>——紅毛壠、鐵船頭、石欄門、沙雞也利、吉靈街、大橋頭、六加基、清水港、泗有港、芭口、七條石等地的端洛（附圖4）華人居民，<sup>85</sup>除了早先在1948年10月因當地居民有窩藏馬共之嫌而被大肆清剿過的紅毛壠與鐵船頭，<sup>86</sup>其餘港門居民在軍警嚴密的看守與輸運下，被集體強制遷離原住居地，陸續搬遷至現今百利與那拉新村所在地，於電力、自來水、馬路、排水道等公共設施付之闕如的陌生土地上重建家園。<sup>87</sup>

馬來亞的軍事戒嚴直到1960年才完全解除，然而，即便是馬共與殖民當局鬥爭形勢最嚴峻的1951、1952年，<sup>88</sup>端洛華人居民在當地軍警嚴格的行動監管、糧食輸送限制的制約下，<sup>89</sup>除了忙於家園的整頓建設，<sup>90</sup>仍努力透過辦事所向政府斡旋，以圖能夠依照往例置辦仙姑誕必備供品（見附表2），並順利在神誕日進入廟中參拜：

<sup>84</sup> 近代霹靂州華人俗稱礦區為「港門」（kong-moon），這個名稱或淵源於英屬時期之前拉律一帶特有的礦地承包制度。有關港門制度的研究可參白偉權，〈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頁84—96。

<sup>85</sup> 〈霹靂端洛增龍會館簡史〉，載《新馬增龍會館聯合特刊》（檳城：康華印務公司，1966），頁45；訪談紀錄：羅○，2023年4月24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sup>86</sup> 「馬來亞僑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檔案11-29-06-07-039，「馬來亞華僑之近情及其將來·（八）新緊急條例與僑農」、「馬國於 Lin(g) tang、Jalong 及 Tronoh 焚燬僑農房屋各案檢呈來往函件敬請鑒核由」；〈華籍村民八百名露宿端洛街場上我領館要求政府救濟〉，《南洋商報》，1948年10月21日，版7。

<sup>87</sup> 百利與那拉新村先後建立於1950年、1951年。〈端洛那拉村史〉，載《近打縣十大新村協理理事會慶祝十週年紀念特刊》（華都牙也：近打縣十大新村協理理事會，1996），頁17；〈百利新村村史〉，同前引書，頁36。

<sup>88</sup> 〈怡警方一吉普車在端洛區遇襲兩名警員輕傷〉，《星洲日報》，1952年2月28日，版6；〈端洛警宿舍被襲 居鑾兩巴士遭焚〉，《南洋商報》，1952年3月1日，版8；〈美羅埠鄉村保衛團總部被擲手榴彈未爆炸 端洛膠園工人宿舍附近警方圍襲一女暴徒喪生〉，《南洋商報》，1952年5月5日，版6。另參 Karl Hack, *The Malayan Emergency*, 1, 9-10。

<sup>89</sup> 〈近打六地區將限制糧移〉，《南洋商報》，1952年2月12日，版7；〈近打全縣今日起限制糧食移動 申請運輸糧食准照須至近打縣署或怡及金保（金寶）分署 違犯者將遭罰款或監禁〉，《南洋商報》，1952年11月1日，版7；〈端洛那拉村史〉，載《近打縣十大新村協理理事會慶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17；〈百利新村村史〉，同前引書，頁36。

<sup>90</sup> 以1952年為例，受畢利斯政策影響而遷入那拉與百利兩新村的華人居民，分別約有1890人和2335人。Francis K. W. Loh, *Beyond the Tin Mines*, 126.

對於仙姑誕，眾議入紙申請人情，<sup>①</sup> 便以買辦鮮花、餅菓、三牲，入廟參拜。至春祭請小工兩名全往總墳燒衣了事，<sup>②</sup> 無庸辦三牲各物，以免觸犯統制糧倉條例。<sup>③</sup>

相較於仙姑誕，辦事所對於同樣是每年例行的春祭祭掃義山，則是選擇了更為簡便的方式完成，略去食物供品，避免有違戒嚴時期管制糧食輸送的相關法令。

#### 四、離亂中的歡聚：1950年代後期以來的「新」實踐

依照舊例，歷來逢八月初四之誕期，都無慶祝，如果要，如何慶祝？

《（古廟義塚辦事所）議案照錄》（1960）<sup>④</sup>

1950年代之前，端洛華人所謂的「闔埠街坊」，除了市區新舊街場上的商號和住戶，還包括散居於市郊各港門聚落的居民。（附圖4）緊急狀態在地理空間上截然區隔了市區內外的居民群體、重新塑造聚落的分布樣態，<sup>⑤</sup>（附圖3）另一方面，端洛華人社會半世紀以來一貫以市區居民為重的地方權力結構更是隨之鬆動。下文將透過何仙姑誕儀在1950年代後期的變化——1956年端洛何仙姑廟首次建醮，1957年首開何仙姑八月誕實踐先例——進一步說明，在「緊急」陰影猶未退卻的1950年代後期，此番誕儀的革變既是當地華人居民重新聚合「闔埠街坊」的文化操作，亦是觸發1960年代社區權力結構制度性變革的關鍵起點。

① 「入紙申請人情」指和當局打交道，請託對方權宜核發入廟祭祀的出入准證。

② 「總墳」指端洛華族總墳，位於端洛華人義山。每年清明前後和農曆七月，辦事所職員會組織當地居民前往祭掃，為辦事所例行的春、秋二祭。「燒衣」指焚燒香燭紙錢等祭品以祀神靈。

③ 《議案照錄》，「本年仙姑誕並春祭如何辦法」，1952年3月16日。

④ 《議案照錄》，「關於本埠各區全人來函提及本年陰曆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如何慶祝事」，1960年8月7日。

⑤ 緊急狀態時期，當局在端洛市區外緣以及各區新村出入口，皆部署了鐵刺圍籬線界以及軍警站崗的檢查哨，一般民眾要出入不同的社區界域，必須事先申請通行證。

### (一) 1956年平安清醮與1957年八月誕

由於1950年代前期新村移殖計畫的成功，殖民當局得以有效控管散居的華人人口，馬共的後援補給力量受到重挫，馬來半島的局勢自1954年之後漸次重回當局的控制之中。<sup>96</sup> 與上述政治形勢相呼應的，是1950年代中後期民間社會活力漸趨復甦。<sup>97</sup> 1956年，近打一帶的地方秩序較此前平靖許多，當局因此宣告放寬華都牙也地區包括端洛市區、百利新村、布先、埔地、督牙冷等地在內的糧食運輸法令，民眾無論是採買生活物資或是操辦節日祭俗，皆便利許多。<sup>98</sup> 在看似轉危為安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部分端洛居民組織建醮委員會，發起在地方上舉行平安清醮的倡議，這個計畫得到辦事所的支持。為了辦好這場開埠以來首次舉行的大醮，在埠上頭人李永春的號召下，<sup>99</sup> 辦事所當屆職員不僅決議撥出鉅款補貼建醮，亦趁勢重新整理何仙姑廟門面，由李氏本人統籌廟堂修繕的招工發包事宜。<sup>100</sup> 歷經日佔與緊急狀態十數年危亂滄桑的端洛「古廟」與分崩離析的「街坊」，在市區以及紅毛壠、那拉、百利等新村居民共同籌備與參與醮儀活動的過程中，得以重光與重聚。<sup>101</sup>

<sup>96</sup> Karl Hack, *The Malayan Emergency*, XIX.

<sup>97</sup> 〈端洛百利村大會堂近打縣長剪綵開幕呼籲村民協助政府共謀繁榮〉，《南洋商報》，1954年2月17日，版9；〈端洛中山學校籌建新校舍〉，《星洲日報》，1954年5月17日，版8；〈聯邦九個社團註冊獲准〉，《南洋商報》，1955年11月5日，版9。

<sup>98</sup> 華都牙也批發商發出糧食予零售商並且由軍車護送至各地的運糧時間，自此大幅放寬為每星期二、四、六3天的早上7時起至下午5時止，一改過去每週唯有週四中午才可以運送糧食的規定。〈華都牙也地區運糧法令放寬居民及糧食商皆大歡喜〉，《星洲日報》，1956年7月1日，版11。

<sup>99</sup> 李永春是活躍於1950年代的地方頭人，先後在1954年、1955年被推舉為辦事所兩項物業的資產信託人。〈第二次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總理提論李君永春榮膺近打巴勒區市議員勳銜事」，1954年3月11日；〈第三次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關於購買吳兆昌君之樹膠園價錢事」，1954年9月24日；〈全體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本埠新街場二十四號門牌選回受託人填補該職」，1954年9月24日。

<sup>100</sup> 〈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關於古廟義塚辦事所撥款建醮事」、「討論修理古廟神枱及各件」，1956年8月12日；《古廟義塚進支部》，「余東海對做古廟神枱一單共去190元」、「溫壽對古廟斬草修路工資共去62.3元」，「古廟對捐助建醮去1000元」，1956年8月24日；《古廟義塚進支部》，1956年9月3日。

<sup>101</sup> 1956年建醮應是在當年農曆七月二十九日前後舉行。《古廟義塚進支部》，「古廟對捐助建醮去1000元」，1956年9月3日。

尾隨1956年農曆七月大醮而來的，是1957年起每年農曆七月底、八月初之間以醮儀為核心的演戲酬神活動。這項新出現的酬神活動，最初是由市區與各新村聯合發起，以「做盂蘭節」之由舉辦，1959年起則正式以慶賀何仙姑八月初四日寶誕之名，逐步發展成為日後端洛年度例行的社區節誕傳統。1957年7月底，距離馬來亞聯邦正式宣告脫離英國獨立尚有1個月，正值各界緊鑼密鼓籌辦慶祝活動當下，<sup>102</sup> 辦事所收到梁敬棠、鄧耀堅、陳錫貴、陳華貴、黃彩等市區與新村居民聯名來函，信中以「古廟降童，本埠要設盂蘭節及演戲酬神」之由，<sup>103</sup> 要求辦事所職員協助辦理相關儀式活動。<sup>104</sup>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在以廣東籍新客為居民主體的端洛，辦事所向來只有春、秋兩祭集體拜祭埠上先人的慣俗，未有於農曆七月盂蘭節另行社區超孤祭幽法事的傳統，<sup>105</sup> 而以往例行於每年農曆三月初七日的何仙姑誕，歷來皆是遵照辦事所《規例》條陳操辦，亦未曾有過建醮與演戲的慶賀之舉。然而，梁敬棠等人信中所提出的「古廟降童」理由，成功說服了辦事所職員，辦事所最終同意協助辦理並捐款贊助相關活動。<sup>106</sup>

1957年端洛何仙姑「本埠要設盂蘭節及演戲酬神」的「神諭」，在辦事所與各區居民通力合作下一一實現。該年農曆七月底盂蘭節的演戲活動甫結束，辦事所隨即於八月初四日在何仙姑廟舉行了一場祀禮，祭品排場類同每

<sup>102</sup> 〈吡華民政務司署獨立後將續存在 華人參事局亦維持現狀〉，《星洲日報》，1957年7月16日，版9；〈吡總商會決定綵飾慶祝獨立〉，《星洲日報》，1957年7月16日，版9。

<sup>103</sup> 「降童」意指神靈降附於人身，藉此傳達特定訊息。

<sup>104</sup> 〈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關於梁敬棠、鄧耀堅、陳錫貴、陳華貴、黃彩五位先生來函」，1957年7月29日。按：梁敬棠是市區昌興號店東，鄧耀堅是百利新村華文小學教師，陳華貴是市區居民，陳錫貴或為陳華貴兄弟，黃彩來自新村。〈吡叻唐洋貨公會舉行開幕典禮〉，《南洋商報》，1936年5月8日，版9；〈古廟義塚辦事所及各區新村代表聯席會議〉，載《議案照錄》，「討論本年八月初四日何仙姑誕應如何慶祝」，1966年6月19日；訪談紀錄：羅○，2023年4月24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sup>105</sup> 端洛一直沒有形成在農曆七月舉行大規模祭祀活動的習俗。一位地方上的報導人是這麼告訴筆者的：「端洛不做盂蘭盆，因為福建人少，檳城、新山做的多（按：檳城、柔佛州新山的華人人口以祖籍福建者為多數）。」訪談紀錄：鄒○光，2016年9月2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sup>106</sup> 《古廟義塚進支部》，「七月廿六日/八月廿一號·捐助古廟盂蘭節演戲去400元」，1957年8月21日。

年例行於三月初七的何仙姑寶誕，<sup>107</sup>這是該廟自1897年成立以來，首次於農曆八月舉行祭祀酬神之事，開創了當地何仙姑八月誕的先例。這場空前的七月盂蘭節與八月仙姑誕，次年即因霹靂當局於中霹靂的和豐、朱毛(Chemor)與南近打一帶施行該州自緊急狀態以來規模最大的「戩亂」行動——「薑星行動」而停辦，<sup>108</sup>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1959年起，辦事所恢復此前「不做『農曆七月』」、「不做盂蘭」的舊例，卻將八月誕的實踐保留了下來，至於兩年前以盂蘭節之名首行的打醮與演戲活動，則移至八月初四日與仙姑誕日的慶壽儀典一起進行。<sup>109</sup>「何大仙姑娘娘」自此在端洛一年有兩次「寶誕」誕期。

## (二) 1960年八月誕的制度化與社區權力結構變革之發端

緊急狀態後期辦事所因應居民所請而協力辦理的八月誕，對於端洛華人社群而言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相較於誕日時間與賀誕方式皆明訂於辦事所《規例》且行之有年的三月誕傳統，此一剛萌芽尚處於摸索階段的儀式實踐，反映的是辦事所「舊例」之外的新興力量——市郊居民勢力的崛起。1960年緊急狀態正式結束，政治情勢與社會氛圍進一步和緩，馬來亞錫業亦有欣欣日榮之勢。<sup>110</sup>在端洛各區民眾特別是新村居民的熱切推動下，以「演

<sup>107</sup> 該日支出細項內容，大致符合一般三月初七誕日常見的花銷項目，如生花、生菓、三牲、寶燭、棋子餅、小工工資等。《古廟義塚進支部》，「黃英財對生花碟十隻去5元」、「慶記對寶燭一單去15元」等10筆，1957年8月28日。按：該年三月誕花銷明細可見《古廟義塚進支部》，「慶記對寶燭什物一單去29.7元」等10筆，1957年4月8日。

<sup>108</sup> 端洛屬於南近打「星」行動區的範圍，當局在該行動區內的某些新村實行集中炊飪（大鍋飯）制，對礦場則施行糧食統制以及嚴厲的食物運輸控管。在「薑」、「星」行動下，那拉、百利新村先後於該年4月和8月實行集炊與戒嚴管制。〈吡州務大臣招待記者披露開始「薑」、「星」戩亂行動一千六百里二十四萬人受影響〉，《南洋商報》，1958年1月17日，版10；〈吡當局杜絕馬共糧食供應昨展開薑星兩項行動分別在南近打和豐朱毛地區實施集炊加強宵禁統制食品〉，《星洲日報》，1958年1月17日，版9；〈端洛那拉新村下週實行集炊〉，《南洋商報》，1958年4月4日，版10；〈吡雙溪留連等四新村當局宣布戒嚴令柵門提前於下午四時關閉〉，《南洋商報》，1958年8月25日，版10。

<sup>109</sup> 《古廟義塚進支部》，「何仙姑誕數七條一單去76.2元」，1959年9月8日；《古廟義塚進支部》，「古廟對捐助仙姑誕演戲（去）100元」，1959年11月1日。

<sup>110</sup> 〈聯邦首都股票市況〉，《南洋商報》，1960年6月15日，版4；〈錫消費如維持當前情況錫價勢將振高端洛錫礦（按：Tronoh Mines Company）主席長年報告中指出錫生產依然無法供應世界需求〉，《星洲日報》，1960年10月12日，版10。

戲酬神」為核心主軸的八月誕，很快就於1960年代伊始進入制度化階段，伴隨而來的是辦事所歷來以市區居民為主要參與者的選舉制度的重大變革。

1960年7月31日馬來亞政府當局正式宣告緊急狀態終止。8月7日（庚子閏六月十五日），由於此前各區新村居民紛紛去函辦事所，詢問該年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的慶賀辦法，辦事所遂召集職員開會商議如何因應：

職員會（議）開始，首由梁敬棠先生閱讀各區來函句語，俾各職員知之，從（而）提議：依照舊例，歷來逢八月初四之誕期，都無慶祝，如果要，如何慶祝？待下星期另召集各區代表會議。今由街坊辦事所（按：即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書記寫信通知各區村長及回覆各區來函人信件，使各區村長派代表及來函人屆時要到會，共同磋商一切事宜。如果有演戲慶祝，本古廟義塚辦事所，依照1959年捐壹佰元。（眾議）通過。<sup>⑩</sup>

根據與會者昌興號東主梁敬棠的發言，可知新村居民要求舉辦的何仙姑八月誕，雖然已有1957年、1959年兩次前例，但實際上並非古廟固有的誕儀傳統，與「舊例」不符，沒有明確的慶賀之法可以依循。不過，為了因應輿情，辦事所職員決定召集各區新村代表與來函人一起開會磋商如何行事。這場八月誕應否行之的討論，最終在辦事所捐款贊助下，以演戲慶祝的方式如期舉行。<sup>⑪</sup>

新村街坊的期盼顯然不僅止於此。1960年八月初四日全埠上下為何仙姑賀誕完不久，專門為籌辦此次八月誕而成立、成員包含辦事所職員與各區新村代表的「古廟演戲酬神委員會」，即去函辦事所請求在埠上搭建永久性戲棚。該訴求在10月9日（八月十九日）辦事所職員會議上獲得全體職員支持，眾人推派當年副總理陳繩並與總理代表李永安為辦事所代表，與政府進行交涉以辦理申請戲棚用地等手續。<sup>⑫</sup> 很明顯，演酬會建戲棚的訴求以及辦事所的應承辦理，是為了便利日後繼續舉行神誕演戲活動而預做準備。不

⑩ 〈本年第一次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關於本埠各區全人來函提及本年陰曆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如何慶祝事」，1960年8月7日。

⑪ 《古廟義塚進支部》，「古廟辦事所捐助演戲去100元」，1960年9月19日；《古廟義塚進支部》，「黃英財對賀誕花牌生花一單37」等8筆，1960年9月27日。

⑫ 〈本年第二次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關於古廟演戲酬神委員會來函請求古廟義塚辦事所當年總理及職員與政府申請地方搭永久性戲棚事」，1960年10月9日。

過，就後來的發展而言，同場會議裡另一項由黃姓職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將各區新村加入古廟義塚辦事所為職員一案，<sup>⑩</sup> 影響顯然更為深遠：

由黃松煥先生提出，百利村、那啦（拉）村加入古廟義塚辦事所為職員事，鄧耀堅先生提議，現職員會（議）不能決定，此乃歷年傳下規則。不如召開街坊全體大會，然後實行議決。<sup>⑪</sup>

辦事所歷來以闔埠街坊的代言人自謂，事實上，依據半世紀以來的慣例，有資格參與辦事所職員選舉與議事者，僅限市區居民，主要是落戶或設立於新舊街場上的富戶、商號與結社組織。<sup>⑫</sup> 由於黃氏納入新村居民的提議有違此一「歷年傳下規則」，大家決定一週後另外召開街坊全體大會討論。

1960年10月16日（八月二十六日）的街坊大會對於端洛全體華人居民而言，不僅是該年長達1個月的八月誕大戲真正落幕的時刻，更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76位市區居民與商號社團代表通過修改辦事所的選舉規則，決定自下一年度（1961）起，將百利、那拉、紅毛壠、鐵船頭等各區新村推舉的代表，正式列入辦事所職員席位之中。半世紀以來對於闔埠「公眾之事」沒有話語權，緊急狀態時期又被迫撤離家園而成為不同移殖新村成員的市郊（包括礦場、膠園、椰園、林場等地帶）居民，首次被賦予參與埠上核心決策機制的機會：

全體大會執行討論後通過修改選舉規則。今晚街坊全體通過古廟義塚辦事所選舉明年度職員，要將各區新村加入，決定每區佔職員位數，百利村二名、那啦（拉）村二名、紅毛壠區一名、鐵船頭一名。今將（沿）舊例，每年正月十五日選舉，各區新村由商號或人名代表，名稱為「職員」，各區職員席位由其本村人挑選，所佔

<sup>⑩</sup> 古廟義塚辦事所的正式成員謂為「職員」。自其1930年復會後一直到1960年首度發生制度上的變革，辦事所內部的組織架構基本維持一致，其組成成員的角色、員額與基本職責內容，如附表3所示。

<sup>⑪</sup> 〈本年第二次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黃松煥先生提出百利村那啦（拉）村加入古廟義塚辦事所為職員事」，1960年10月9日。

<sup>⑫</sup> 廖小青，〈「街坊辦事所」：神廟自治組織與英屬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1897—1945）〉，待刊。

席位數列入古廟義塚辦事所選舉表上，再選之票多者為職員，如各不入選時，亦有評議員之職位。<sup>①⑦</sup>

至於自緊急狀態後期開始以新村民眾為主所推動的八月誕，在這場會議中亦獲得了初步制度化的辦理規範——日後每一年度無論是否舉辦此誕，皆須在該年農曆五月初一日前向辦事所提出，並由其召開各區全體大會議決：

歷年以來此誕（按：指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都無慶祝。今晚街坊全體大會議決，如要籌款演戲慶祝，或不慶祝，需要每年五月初一日預早召開各區全體大會決定。倘在五月初二日以後提出演戲慶祝者，本古廟義塚辦事所當年職員，概不接受辦理等手續。<sup>①⑧</sup>

上述規定亦間接說明了，此前數次端洛八月誕相關活動的舉行，並非廟方或辦事所主動提出，而是由辦事所外的居民勢力特別是新村居民所發起，辦事所被動受理。無論是修改辦事所選舉規則或是確立八月誕施辦程序，1960年下半年這一連串密集動員的各式會議之最終結果所共同揭示的是，新村居民被納入辦事所職員之列，與他們自緊急狀態後期開始推動八月誕演戲酬神的行動，實際上是一體兩面。

1960年10月街坊大會的決議很快在隨後兩年內獲得初步落實。1961年開春之際，辦事所年度例行的職員選舉大會將原有的「評議員」職位進一步劃分為兩類：一是「市區評議員」，員額仍為既有的10席；二是破天荒新設的「新村評議員」，員額至多為6席，<sup>①⑨</sup>由各區推派代表擔任，這是辦事所首次將市郊居民納入辦事所組織結構。<sup>②⑩</sup>同年6月13日（五月初一日），依循上年街坊大會決議，辦事所召開了史上第一次職員與新村代表聯席會議，討論該年八月誕的慶祝方式。與會眾人決定依照緊急狀態後期以來的作法延請粵劇

<sup>①⑦</sup> 〈街坊全體大會〉，載《議案照錄》，「黃松煥先生提出各區新村加入市區古廟義塚辦事所為職員事」，1960年10月16日。

<sup>①⑧</sup> 〈街坊全體大會〉，載《議案照錄》，「討論每年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之期」，1960年10月16日。

<sup>①⑨</sup> 根據1960年街坊大會決議，百利與那拉兩村各佔職員席位二名，紅毛壠與鐵船頭兩區則各佔一名。

<sup>②⑩</sup> 〈全體商號選舉古廟義塚辦事所辛丑年職員大會〉，載《議案照錄》，「選舉辛丑年職員」，1961年3月1日。

團演戲慶祝，同時亦決議募款搭建永久性戲臺，在各區新村代表的要求下，辦事所同意捐款贊助搭建工程。<sup>121</sup>

上述發展至1962年則更進一步。各區新村代表自該年起，得以正式列席職員選舉大會，與市區居民一同行使辦事所職務的選舉與被選舉權。<sup>122</sup> 端洛市郊民眾的角色自此成為辦事所權衡閩埠居民「公意」、「公益」時不可忽視的部分。不僅如此，在農曆五月初一日討論該年八月誕慶祝辦法的聯席會議上，因應八月誕常態化辦理的任務型委員會——古廟演戲酬神委員會（以下簡稱「演酬會」），<sup>123</sup> 首度以五區均權的原則擇選成員，針對最重要的主席與查數員職位，端洛市區以及百利、那拉、紅毛壠、鐵船頭等區，皆必須有1名代表出任，籌組「五區主席團」<sup>124</sup> 與五區查數員（團）。<sup>125</sup> 1962年演酬會的組成架構，象徵性體現了端洛華人社區自1950年代以來所歷經的分合，成為日後地方上為籌辦建醮與八月誕而組織特別工作委員會時所依循的範式。另一方面，隨著新村勢力被正式納入辦事所組織結構之中，市郊居民最初藉以展露頭角的演酬會，亦成為辦事所歷來因應埠內外突發事件或編派任務所權宜組織的委員會中，<sup>126</sup> 唯一發展成常態性建制的任務型委員會，而與

<sup>121</sup> 〈古廟職員及各區新村代表聯席會議〉，載《議案照錄》，「討論本年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應如何進行慶祝」，1961年6月13日。

<sup>122</sup> 〈全體商號及各新村聯席選舉壬寅年古廟義塚辦事所職員大會〉，載《議案照錄》，1962年2月19日；〈端洛古廟義塚選舉新職員〉，《星洲日報》，1962年2月21日，版13。

<sup>123</sup> 「古廟演戲酬神委員會」名稱首見於1960年10月9日辦事所職員會議的紀錄中。該特別委員會當時是為了籌辦該年八月誕而成立，曾向辦事所提出搭建永久性戲棚/戲臺的訴求。〈本年第二次職員會議〉，載《議案照錄》，「關於古廟演戲酬神委員會來函請求古廟義塚辦事所當年總理及職員與政府申請地方搭永久性戲棚事」，1960年10月9日。

<sup>124</sup> 主席團主要的權責有二，一是從各區挑選募捐員，進行誕期活動期間的募捐事宜；二是委任各區男女代表共15人組成「請戲小組」，負責延請粵劇戲班來埠演出，以及向政府申請核准演戲與募捐活動的「禮申」（license，准證）。〈古廟義塚職員暨各區新村代表聯席會議〉，載《議案照錄》，「討論本年農曆八月初四日何仙姑誕應如何進行慶祝」，1962年6月2日。

<sup>125</sup> 〈壬寅年古廟義塚職員暨各區新村代表聯席會議〉，載《議案照錄》，「討論本年農曆八月初四日何仙姑誕應如何進行慶祝」，1962年6月2日；〈端洛古廟演戲慶祝何仙姑寶誕〉，《星洲日報》，1962年6月29日，版15。

<sup>126</sup> 有別於廟宇和義塚管理事務可因循既定的規程辦理，對於常例之外涉及公眾的非日常事件，英屬時期的辦事所通常是以「街坊會議」、「華僑會議」之名，召開居民大會商議處置辦法，並於會中籌組特定工作委員會專門負責執行，成員不限辦事所職員，相關討論參見廖小菁，〈「街坊辦事所」：神廟自治組織與英屬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1897—1945）〉，待刊。

此相映的發展，正是八月誕在1960年代逐步發展為重要性凌駕三月誕的地方節俗。如同既有的三月誕傳統一直以來從未因任何變故而中斷，初現於緊急狀態後期的八月誕實踐，實為端洛當地華人居民以何仙姑廟為中心所進行的年度潔淨與團結社區的文化展演，在日後逐年於何仙姑廟行禮如儀的祭典、醮事與戲臺上演的鏗鏘大戲場景中，成為「鎮上眾多居民同心協力辦好一樁大事的關鍵時刻」。<sup>127</sup>

## 五、結論

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端洛華人社群一方面以當地華社權威機構——古廟義塚辦事所為中心，勉力延續舊有的何仙姑三月誕傳統；另一方面先後於1956年農曆七月始行建醮、1957年首度舉辦農曆七月打醮演戲和八月神誕酬神活動，糾合市區與新村居民，重新凝聚畢利斯計畫施行前住居於市區與市郊各港門聚落的「闔埠街坊」。隨著緊急狀態於1960年結束，此番實踐在1960年代初始便以何仙姑八月誕之名步向制度化與常態化，端洛華人社區的邊界與「闔埠同心」話語，在此後週年性例行、每十年擴大舉辦的「打醮」與「演戲」社區誕俗儀節中，被重複地確認與強固。如同華南原鄉醮會中最重要的部分——巡遊 (procession)，其目的是透過儀式的象徵性展演，定期集結有「份」參與打醮的社區成員共同勾畫社區（宗族/村落/村落聯盟/鄉里）疆界，<sup>128</sup> 端洛十年大醮期間每日晨宵必須由演戲酬神委員會主要職員、端洛四區代表、代表當地全體華人居民之「榜首」、「榜尾」共同參與的「朝旛」儀式，亦體現了相同的意義。<sup>129</sup>

端洛華人透過以醮儀為核心的演戲酬神活動，因應緊急狀態前期的社區解體與社群分離，藉以重新聚合社群並更新界畫該埠之「境」的範圍和「有份」承仙姑之祐的街坊成員，與此同時，此一嶄新的實踐亦成為郊區居民群

<sup>127</sup> Wong Soi Yin, *From Mining Kongs to Ipoh*, 256-257.

<sup>128</sup> James L. Watson, "Fighting with Operas: Processionals, Politics, and the Spectre of Violence in Rural Hong Kong," i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eds. David Parkin, Lionel Caplan and Humphrey Fisher (Providence &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6), 149; 蔡志祥, 《酬神與超幽(上卷): 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 頁78—80。

<sup>129</sup> 十年大醮一系列法事中，每日早晚重複於仙姑廟外、市區通往仙姑廟路口、紅毛壠村口、那拉新村村口、市區通往百利新村路口這些地點舉行的「朝旛」，是上述居民代表唯一有義務全程參與的儀式。又，尋常年度為期一日的小醮，朝旛儀式只在八月初四日夜間於廟外舉行一次。

體趁勢打入地方權力核心的憑藉。與誕期中的醮儀展演相互呼應，八月初四日廟內賀誕典禮舉行時所宣讀的〈何仙姑寶誕賀文〉，明確凸顯了端洛市區、那拉新村、百利新村、紅毛壠四區居民在誕儀中共同肩負的協作者和參與者角色。進一步對比三月與八月兩個「寶誕」的誕儀和賀誕疏文，可以知曉，相較三月誕歷來皆由古廟義塚辦事所／何仙姑廟管理委員會話事，1950年代後期興起的八月誕則是由演戲酬神委員會主其事，依照四區均勢的原則建構委員會組織與分派職務，而新村居民的角色顯然是箇中關鍵。

承上，端洛何仙姑廟農曆八月誕俗的醞釀與踐行，反映的是20世紀中期前後郊區居民勢力的崛起。端洛市郊各港門聚落的華人居民中，許多是錫礦場、膠樹園和伐木場的從業人員，他們的社會動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已略現端倪，<sup>130</sup>不過，這股勢力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前都未能納入該埠華人社群的權力中樞——古廟義塚辦事所的權力結構。畢利斯計畫裂解了原來的社區，卻也為市區外的居民群體創造了新的集結空間。無論是八月誕的發起，或是由此因勢利導所觸發的古廟義塚辦事所權力結構變革，都是這股新興勢力在地方進一步凝聚與抬頭的具體呈現。

作為遭受畢利斯計畫衝擊最大的州屬，<sup>131</sup>端洛的實踐在霹靂並非孤例。舉例來說，無論是與端洛同為近打錫礦業重鎮的督亞冷、金寶、美羅(Bidor)，或是霹靂錫礦業首興之地太平，現今當地華人居民自詡有「百多年歷史」的地方演戲酬神節俗，實際上都是發端與醞釀於1950年代後期。1956年，督亞冷華人自開埠以來首度「聘請名班蒞埠演劇酬神」，慶賀當地「街坊廟」譚公廟主神誕辰，為此當局不僅特別放寬宵禁令至午夜12時，更特許附近3個新村的居民於夜間搭乘巴士前往市區看戲。<sup>132</sup>1957年，金寶「古廟義

<sup>130</sup> 〈端洛三礦場發生罷工風潮 工入要求增加工資不遂〉，《星洲日報》，1941年2月3日，版4；〈端洛鑛業工友分會決致函挽留陳嘉庚並電國民政府擁護團結 明日決分十隊出發售花〉，《南洋商報》，1941年3月28日，版14；〈近打膠園工友公會黃花節舉行開幕 敦請陳活水主持典禮致詞 以四事勉各工友〉，《南洋商報》，1941年4月1日，版13；〈端洛樹膠園工友公會選定四救濟會委員 負責救濟工友傷殘事件 五一節決休息一天紀念〉，《南洋商報》，1941年4月28日，版14。按：霹靂近打礦業工友公會的端洛分會成立於1941年之前，端洛也是近打膠園工友公會總部的所在地。

<sup>131</sup> 1950年代馬來亞各州因施行畢利斯計畫而成立的新村總數為480，新村人口總數為572917。其中，霹靂州的新村數為129（26.88%），新村人口數為206900（36.11%），無論是新村數或新村人口，霹靂都是佔比最高的州屬。Kernial Singh Sandhu, "Introduction: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XLVIII.

<sup>132</sup> 〈督亞冷埠華人演戲酬神 名伶倩影儂義乞以贊助同漢學校〉，《星洲日報》，1956年8月13日，版11。

塚聯合會」，<sup>133</sup> 應當地「街坊眾善信」所請，在該市與金寶區各新村居民樂捐支持下，以慶賀農曆九月十九日觀音誕之名，舉行了一連9日的建醮與粵劇表演，這是金寶古廟自1904年重修以來首次「演街戲」，<sup>134</sup> 盛況空前，兩年後這樣熱鬧的場景亦開始步入制度化的進程。<sup>135</sup> 1958年伊始，美羅埠上創建於1885年的太上老君廟，首次在神誕日舉辦慶誕建醮與演劇酬神，木偶戲班、喃嘸班與粵劇團於歷時7日的誕期中輪番出場。<sup>136</sup> 該年年底，近代霹靂錫礦業奠基者——太平的廣東社群在太平北吡叻（按：「霹靂」舊譯）廣東會館鉅資贊助下，對當地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太平何仙姑廟進行大規模重修，在廟宇重新落成開光之際，亦透過建醮和演劇活動「廣結善緣」、「酬神慶祝」。<sup>137</sup>

神誕、醮會、神功戲，都是近代移居馬來亞的華南新客熟悉的原鄉文化實踐。端洛何仙姑信仰淵源於廣東增城，當地民眾一年兩次於農曆三月與八月為仙姑慶壽的誕俗行之有年。<sup>138</sup> 然而，自19世紀末端洛開埠與該埠何仙姑廟創立以來，短短一甲子內，「何大仙姑千秋寶誕」歷經了20世紀前半葉只辦三月誕到1950年代後期以降八月誕的醞釀與制度化，前述霹靂諸埠華人社區或亦如是。環繞特定神祇傳說話語的廟宇節俗於馬來亞礦業社會的曲折發展與變異，不僅反映了新客移民生存處境的複雜多變，同時展現出他們在關鍵歷史節點策略性檢擇與操作既有文化資源以凝聚社群、應對世局遷變的能動性。就端洛何仙姑誕而言，年年三月誕不間斷循「舊例」行禮如儀，是週期性演示海外移居地與華南原鄉之間的文化連結。相對於此，1950年代在全球冷戰和馬來亞緊急狀態下登場的八月誕演戲酬神實踐，是端洛華人面對彼

<sup>133</sup> 「古廟」指金寶古廟，為金寶當地首要華人神廟，主神為觀世音菩薩。

<sup>134</sup> 「街戲」在新馬一帶為酬神戲之意，類同香港的「神功戲」。余淑娟，〈戲曲贊助與街戲的變遷：以新加坡韭菜芭城隍慶典為例〉，《民俗曲藝》，2007年，第155期，頁228；訪談紀錄：洗○燕，2023年7月30日。

<sup>135</sup> 〈金寶古廟訂下月初演劇酬神〉，《星洲日報》，1957年10月20日，版11；〈金寶古廟建醮 演戲酬神〉，《南洋商報》，1957年11月12日，版11；〈金寶古廟華僑義塚聯合會通過演劇酬神辦法〉，《南洋商報》，1959年10月1日，版11。

<sup>136</sup> 〈美羅老君廟 慶祝神誕 演戲酬神〉，《星洲日報》，1958年1月31日，版10。

<sup>137</sup> 〈太平何仙姑廟重修落成 訂期開光建醮演劇〉，《南洋商報》，1958年11月25日，版10。

<sup>138</sup> 廖小菁，〈何仙姑與七郎婆——廣東何氏宗族的女性祖先崇拜與歷史敘事〉，《新史學》，第26卷，第4期（2015年12月），頁133—134。

時「華南—南洋」交流網絡中斷以及殖民政府新村政策裂解社區的衝擊，於他鄉自做新天地、永固家園基業於斯土的集體盟誓。

透過緊急狀態時期霹靂華人社區廟宇誕俗的革變，我們可以看到，面對畢利斯計畫所謂「移殖」(resettlement)實則是毀人家園、監控人民行動自由的遷徙安置政策，地方上的華人社群並非全然如過去許多研究新村的學者所明說或暗示的那樣，僅是消極順從的被保護者、被動無聲的服膺者，<sup>139</sup>或是鋌而走險的抵抗者。<sup>140</sup>以端洛而言，辦事所於此中運籌演謀，扮演了關鍵的協調者角色。在英國對於殖民地地方宗教活動相對寬容的治理政策下，<sup>141</sup>端洛華人居民透過以神誕、醮會為名的集眾活動，承繼固有傳統、凝聚整合社群，並進一步在過程中籌謀自身地位的改善。緊急狀態時期端洛何仙姑廟與霹靂州其他市鎮重要華人廟宇的相似實踐，共同展示了近代徙居馬來亞的新客華人，如何藉由廟宇組織的運作和神誕儀式活動的多元實踐，在殖民政制下持續地擘劃與經營地方社區、組織和凝聚華人社群，身處20世紀治亂無常、不同政治勢力傾軋的世局之中，不斷勉力蛻變重生與維繫日常。與此同時，信仰作為當地社群回應當下生活處境的文化策略，因而進入了全新一輪地方性演繹的創造與變遷過程。

(責任編輯：任建敏；實習編輯：夏薇、趙曉婧)

<sup>139</sup> Edgar O'Balance,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1960*, 109-129; Lawrence K. L. Siaw,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89-103; Richar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102-105.

<sup>140</sup> 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127-160.

<sup>141</sup> Barbara E. Ward, "Regional Operas and Their Audience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David Jo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62.

### 附錄1：（三月初七日）何仙姑寶誕賀文

謹誠恭祝千秋寶誕。

道尊太極，先天先地而生。德重虛無，至妙至微而立。科傳亙古，教受於今。

凡有聖誕，禮宜祝賀。

茲據端洛闔埠善信等恭維，昊天至尊玉皇大帝陛下，九天稱極，萬聖欽崇。

本境供奉銀河得道何大仙姑，陰陽合德，日月同光。奉上天之勅命，施下土之威靈。善信等藉賴於迴扶。

今歌功而頌德，聖恩不負，大德當酌。敬卜三月初七日之誕辰。

本年度（何仙姑廟委員會）各職員及闔埠善信等百拜。

伏願福播民間，國家昌盛，民族安寧；街坊繁榮，各區昇平；埤瑯穩當，<sup>⑫</sup>膠價日昇，木材興旺，<sup>⑬</sup>商賈興隆，耕耘豐收，六畜蕃昌；老添福壽，少旺丁財；災非不染，禍患無侵。

恭維三寶以證明，伏請仙姑而洞鑑。

東嶽壽筵開，西方聖國來。南山稱不老，北斗上瑤臺。<sup>⑭</sup>

### 附錄2：（八月初四日）慶賀聖誕集福榜文（2016）

太上三五都功經籙奉行科事臣朱漢榮率道眾。俯伏百拜上言。

今據端洛埠眾善信。座落各福門吉向安居。奉道修建。祝賀何仙姑娘娘。聖誕千秋。朝真禮斗。施食超幽法會。請福迎祥。善信端洛何仙姑廟酬神演戲委員會……偕同合埠眾善信人等。即秉同誠。拜干天鑑。詞稱信等。生逢盛世。濟遇昌期。感天地以生成。荷三光而普照。沾恩有日。介福方來。茲逢八月初四日。迺銀河得道。何大仙姑娘娘。聖誕方（芳）辰。眾信人等。聯結一心。同修寸善。樂助資財。延道眾在廟內。立壇修建。祝賀聖

<sup>⑫</sup> 「埤瑯」為馬來語「礦場」之意，「穩當」為粵語「興旺」之謂。「埤瑯穩當」意指錫礦場運作順利和營收豐厚。招觀海，〈天南遊記（續）〉，《海外月刊》，1935年，第32期，頁44—45。

<sup>⑬</sup> 「膠價」與「木材」，分別指橡膠與伐木業，是當地往昔除了錫礦業之外的另外兩項主要產業。

<sup>⑭</sup> 「（三月初七日）何仙姑寶誕賀文」，手鈔本未註明抄錄日期，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誕千秋。法事一晝連宵。朝真禮斗。哦經拜懺。祇陳香花淨供。上奉金闕高真。下超孤幽等眾。均承道力。各證生方。澤此善功。仰祈福祐。伏願天開壽域。聖壽無疆。祝庇眾等。家家迪吉。戶戶平安。男添百福。女納千祥。星庚光彩。鴻運亨通。老添福壽。少降麟祥。凡未形言。永符所願。謹榜以聞

奉行科事朱漢榮 榜具

天運二〇一六年 歲次丙申年八月初四日<sup>145</sup>

### 附錄3：（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賀文

謹誠恭祝千秋寶誕。

道尊太極，先天先地而生。德重虛無，至妙至微而立。科傳亙古，教授於今。

凡有聖誕，禮宜祝賀。

端洛市區、那拉新村、百利新村、紅毛隆（壠）區，榜上列位各善信等，百拜恭維昊天至尊玉皇大帝陛下，九天稱極，萬聖欽崇。

本境供奉銀河得道何大仙姑，陰陽合德，日月同光。奉上天之敕命，施下土之威靈。善信等藉賴於迴扶。仗五員之羽士，建三晝四宵之科儀。今歌功而頌德，聖恩不負，大德當酌。敬卜八月初四日之誕辰，遇聖誕而演戲，值良辰以建醮。上奉高真，下祈福利。伏願醮當天府，福播民間；國家昌盛，民族安寧；街坊繁榮，各區昇平；埤瑯穩當，膠價日昇，木材興旺，商賈興隆，耕耘豐收，六畜蕃昌；老添福壽，少旺丁財；災非不染，禍患無侵。

恭維三寶以證明，伏請仙姑而洞鑑。

東嶽壽筵開，西方聖國來。南山稱不老，北斗上瑤臺。<sup>146</sup>

<sup>145</sup> 「（八月初四日）慶賀聖誕集福榜文」，2016年9月4日，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

<sup>146</sup> 「（八月初四日）何仙姑寶誕賀文」，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藏手鈔本，未註明抄錄日期。

附表1：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何仙姑誕開支明細（19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數    | 支林釘小工三天 | 支古廟買花旗燈筒一枝 | 支古廟買棗一擔 | 支往廟拜神手車來回腳 | 支李正記買生果一單 | 支李正記往填羅買生果車腳 | 支南番順公會生花四盆 | 支□□燈租兩晚 | 支國公史酒一枝 | 支檀香梘半 | 支燒衣飯酒共 | 支李正記往填買花車腳 | 支買火肉 | 支大豚鴨一只 | 支大闖雞一只 | 支怡心樓飯菜煙仔共 | 支怡心樓色餅三盆 | 支俾生花電車腳 | 支富春園生花一單 | 支裕和隆什貨一單 | 支富榮華八音班 | 三月初七日 |
|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去     |
| 78.14 | 3       | 30         | 30      | 20         | 4.1       | 66           | 2          | 4       | 1.65    | 17    | 20     | 66         | 60   | 65     | 2.06   | 2.21      | 2.4      | 2.7     | 13.5     | 6.78     | 30      |       |
| 元     | 元       | 分          | 分       | 分          | 元         | 分            | 元          | 元       | 元       | 分     | 分      | 分          | 分    | 分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資料來源：《古廟義塚進支部》，1931年4月22日。

附表2：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何仙姑誕開支明細（1951—1955）

| 年份   | 支出項目             | 金額（元） | 總數（元）  |
|------|------------------|-------|--------|
| 1951 | 古廟對仙姑誕各項用銀       | 161.8 | 161.8  |
| 1952 | 古廟對仙姑誕各項用銀       | 131.8 | 131.8  |
| 1953 | 古廟對仙姑誕黃英財生花一單    | 44    | 167.35 |
|      | 古廟對仙姑誕榮發寶燭一單     | 10.1  |        |
|      | 古廟對仙姑誕榮發蛤蚧貳枝三蒸一枝 | 13.8  |        |
|      | 古廟對怡棧茶貳席餅什物一單    | 77.45 |        |
|      | 古廟對民與生菓一單        | 13    |        |
|      | 古廟對泉生電車腳         | 6     |        |
|      | 古廟對小工一名          | 3     |        |
| 1954 | 古廟對仙姑誕十三條共去銀     | 188.5 | 188.5  |
| 1955 | 古廟對仙姑誕黃英財生花一單    | 42    | 190.45 |
|      | 榮發對什貨寶燭一單        | 5.3   |        |
|      | 夏彩成對仙姑衣全套金花一對    | 12    |        |
|      | 丁祺南對生菓共一單        | 13.4  |        |
|      | 車費對定（訂）、偈花車腳來往二次 | 10    |        |
|      | 黃華對小工            | 4     |        |
|      | 黃佳對火肉            | 8     |        |
|      | 通興對闖雞一只          | 9.8   |        |
|      | 榮發對酒一單           | 14    |        |
|      | 怡棧對辦茶貳席          | 60    |        |
|      | 怡棧對茶烟            | 2.95  |        |
|      | 怡棧對色餅三盆          | 9     |        |

資料來源：《古廟義塚進支部》，1951年4月13日、1952年4月1日、1953年4月20日、1954年4月9日、1955年3月30日。

附表3：端洛古廟義塚辦事所組織架構（1930—1960）

| 職稱  | 員額 | 職責  |
|-----|----|---|
| 正總理 | 1  | 維繫「古廟」（按：指端洛何仙姑廟）與「華僑義塚」運作，監督財務帳目，指揮職員辦理廟宇與義塚相關事務，並負完全責任。   |
| 協理  | 1  | 即副總理，協助正總理辦事，當正總理無暇處理會務時，由協理代理負責。                           |
| 財政  | 1  | 統理古廟、義塚銀兩出入存貯，但不能擅自開支，必須由辦事所給單據憑總理「畫號」（按：簽名）方為有效。           |
| 幹事  | 2  | 由總理指揮，奔走辦理古廟義塚事宜。   |
| 查數  | 1  | 即審計員，稽查古廟、義塚一切進支數目，查確畫號核準事宜。                                |
| 評議員 | 10 | 出席辦事所會議共同參與議案研議，當正副總理無暇出席會議時，在評議員之中選舉一人為該場會議臨時主席，負責表決議案等事宜。 |
| 書記  | 1  | 負責處理辦事來往書信與記帳，記錄義塚入冊號頭單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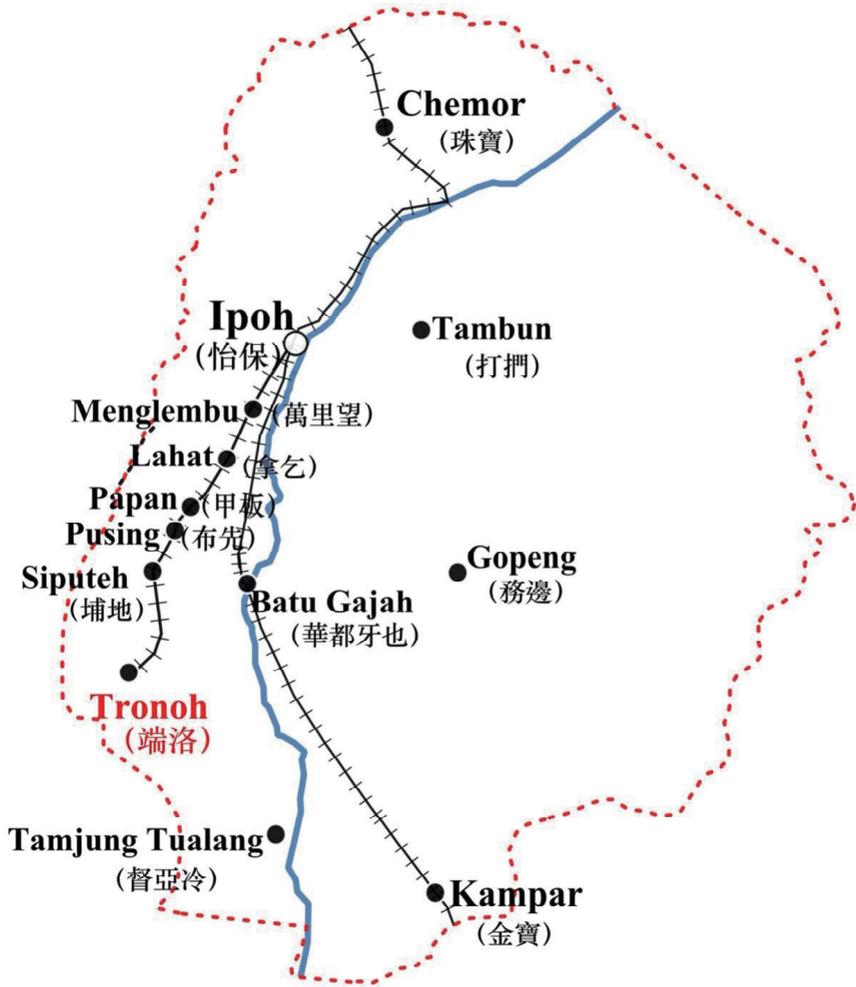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古廟義塚辦事所規例〉，載《議案照錄》，1930年8月10日，條1。

附圖1：霹靂州拉律(Larut)與近打(Kinta)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底圖參考 Google Maps 繪製。

附圖2：近打主要市鎮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底圖參考 Google Maps 繪製。

附圖3：1950年代以來的「端洛埠」範圍



資料來源：底圖參考 Google Maps 繪製，聚落分布訊息來自訪談紀錄：洗○燕，2017年2月20日，通訊訪談。

附圖4：1950年代以前的「端洛埠」範圍



資料來源：底圖參考 Google Maps 繪製，聚落分布訊息來自〈霹靂端洛增龍會館簡史〉，載《新馬增龍會館聯合特刊》，頁45；訪談紀錄：羅○，2023年4月24日，於端洛何仙姑廟。

# Together while Apa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emple Festivals and Local Community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Hsiao-ching LIA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Two temple birthday festivals are held annually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ronoh for their local deity—the Chinese goddess He Xiang. Tronoh is a well-known tin-mining town in Kinta District, Perak, Malaysia (“Malaya” before 1963). One of these two festivals is celebrated in the eighth lunar month, a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nual public event and carnival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other is held in the third lunar month. It is an older festival tradition but nowadays is practiced much more quietl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se different practices in light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During this time, many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British Malaya fell apart under the geodemographic control of the “Briggs Plan”, a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targeting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While the festival of the third lunar month has been conducted in Malaya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50s th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ighth lunar month came into effect.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the Tronoh Chinese Temple and Cemetery Committee—at the center, the eighth lunar month festival was introduced as part of a cultural strategy to symbolically reunify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riggs Plan in the early 1950s, residents had been dispersed into different resettlement areas called “new villages”.

---

Hsiao-ching LIA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Nankang, Taipei 115201, Taiwan. E-mail: hcliao14@gate.sinica.edu.tw.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ighth lunar month festival, the boundarie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as its membership, were updated and clarifie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mple festivals in Tronoh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 as other local Chinese temples in Perak had similar practices. Together, these cases demonstrate how Chinese migrants continuously operated temple organizations and implemented multiple birthday ceremonies for specific deities in order to (re)organize and consolidate Chinese communities living under the colonial regime and exposed to the turmoil and instabilit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 world shaped by diverse political forces, these communities constantly strove to adjust and maintain their daily lives. At the same time, specific deity cults also entered a new round of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s part of a cultural strategy enabling local communities to respond to their changing living conditions.

**Keywords:** Malayan Emergency, Briggs Plan, New Village, *Jiao (Jiu)* festival, Birthday Festivals of He Xiang